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3 年 4 月 30 日第 16 期

## 本期目录

### 〔四川文革专辑〕

#### 蓦然回首

倪伯华 小镇刮来造反风

#### 史林一叶

罗成胜 话说涪陵文革的特点

#### 文摘

曾庆祥 四川文革中的“知情人员学习班”

#### 故纸堆

张国华等 向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传达中央指示

#### 小资料

李晓航搜集整理 四川省甘孜州文革资料部分篇目

#### 编读往来

蒋健来信纠错

罗成胜来信谈文革中军队执政的后果

## 〔四川文革专辑〕

说明：四川省在文革时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大省，所以 1968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的社论用了“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做标题。在这篇社论中，还公布了毛泽东的一句“最新最高指示”——“四川很有希望”。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或写（批示）的？四川的哪方面让他感到“很有希望”？“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未向“人民群众”作过说明。但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后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讲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四川很有希望”的注脚：“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这就是毛泽东所谓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烂透了就会好转的一贯思想。越是大

乱，他越是认为有希望。当毛泽东喜赞“四川很有希望”的时候，四川民众却正生活在血雨腥风水深火热之中。

毛泽东认定文革大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而他眼中的“敌人”却在不断变化、不断扩展。在文革前因紧跟毛泽东、不惜饿死上千万人也要“高举三面红旗”而得到重用的李井泉，文革初期即被毛泽东疑为“刘少奇司令部的人”打倒了；文革前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而被李井泉撤职并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文革中被毛泽东夸赞为“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给予平反、提拔，然而上任两年多即被他作为“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清除了；由毛泽东亲自点将调四川掌握军权并在反对刘、张中立下大功的梁兴初，又在刘、张倒台两年多之后被毛泽东认定是“上了林彪贼船”而无情抛弃了……每一次的“揪出”、“打倒”，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亲自选拔和重用了这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官员、“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大动乱的毛泽东，却不被追究责任。

四川这样的大省，文革历史十分复杂，大事大案很多，历史谜团不少。本刊先编出这个专辑以作引玉之砖，还望各方有识之士提供更多新作及史料以便陆续编出新的专辑。

---

【蓦然回首】

## 小镇刮来造反风

倪伯华

按：本篇节录自作者已经写完、正在修订的长篇回忆录。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文革时为重庆市巴县第四中学初三学生，巴县木洞镇反到底指挥部负责人之一。回忆录全稿由其弟倪伯忠整理、录入。

### 小镇概貌

我的家乡巴县木洞镇，位于重庆下游约 40 公里的长江南岸，东流的长江水到了这里，突转一个 90 度的急弯，折向北奔腾而去。

在文革爆发时，木洞是一个区属小镇，中共木洞区委、区人委（政府）都设在镇上，属重庆市巴县管辖。全区有木洞镇和木洞、水口、栋青、长坪、马家、丰盛、双河、麻柳、羊鹿、清溪、天池十一个公社，人口十万人左右。木洞镇由五个街道地段组成，从西面小河边到东面陡石梯，依次分别称一段（石宝街）、二段（小东门至新街口）、三段（新街口至四方井）、四段（四方井至水沟子街马路路口）、五段（洞上），镇上居民约六千余人。

木洞的得名，缘于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相传当年大禹治水，将这里的洪水引退，人们特建“禹王庙”纪念。但建庙缺少合适的木料，正好鲁班师傅路过此地，便借助神力，施展法术，在西面小河边一高耸的悬崖（狮子崖）下凿开一个

石洞，引出一条天河，源源不断的上等木料便从洞中奔涌而出……从此，这个“洞出神木”的地方就叫作“木洞”了。

自明清时代到民国时期，木洞是川东四大名镇之一，是重庆近郊有名的水码头。这里与南川、涪陵、长寿几县接壤，无论是从长江下游水路上来的商船，还是邻近几县从旱路到重庆去的客商，肩挑背磨的力夫，过路的学子、官员等，都要在此歇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启程，当天下午到达重庆。因此，这里成了商贾繁荣、物流囤积的重要集散地，是连结川、黔商品出川、入川的门户，素有“小重庆”之称。

中共执政后，经过“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镇上店家商铺衰败凋零，在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下，各种特色经营失去活力。随着铁路、公路的发展，运输格局变化，木洞更是失去了原有的地理交通优势。因此，曾经兴旺发达的商贸，渐渐衰落下来，往日喧闹的街面，除了赶场天，慢慢安静得有些冷清了。

文革前的木洞是一个以小手工业为主的城镇。镇上没有产业工人，各类行当如食品加工、竹篾编制，传统的造纸业、修配业、屠宰业等，都是作坊式的生产，比较称得上“工人阶级队伍”的，只有运输社的船工和铁业社的工人。

木洞镇有两所中学，巴县第四中学（简称巴四中）和木洞农业中学（简称农中）。巴四中创建于1950年，是公办的正规中学，其前身是由木洞富商胡裕隆（著名学者胡大泽之父）、丁玉枢（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之兄）等人出资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最初设在木洞中坝，1951年搬到镇东边的一个小山坡上，由一所天主教堂改建。大跃进时期增办高中班，三年大饥荒后取消高中班改为初级中学，学校建制虽然缩小，依然算是木洞的“最高学府”。农中则是一所民办中学，设在交通不便的中坝岛上，校舍简陋，师资素质和教学质量均不能和巴四中相比，安排的课程也不正规。但镇上几所小学每年近200名毕业生中，最多只有极少的10来个人能够幸运进入巴四中，被录取的学生除了学习成绩突出外，还要看家庭出身和父母的政治面貌（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夕在这方面是愈来愈强调），因此镇上大多数能够继续上初中的学生只有到条件较差的农中读书。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笔者正是巴四中初中毕业班的学生。

### 江姐之子彭云前来煽风点火

进入8月盛夏，镇上突然热闹起来。每天重庆到木洞的班船一到，就有很多市里来的学生到镇上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传播各种新闻。通过他们的宣传、鼓动，我知道北京有了红卫兵组织，毛主席还亲自给首都的红卫兵组织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起来造反。

第一次听到“造反”两个字，感到大惑不解。按我的理解，“造反”这两个字多半用在小说中的绿林好汉、江洋大盗、草寇山大王身上，也用在那些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农民身上，褒贬不一，民间则多半带有贬义。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还要鼓动人民起来造反？通过这些学生的引导，结合报纸上舆论的宣传，我才明白，在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内，在各级领导层中，还有一大

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很多权力。毛主席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就是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反就是革命，照毛主席的话干，没错！

到镇上来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外地来的红卫兵，站在街头教唱当时最流行的造反歌曲：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

“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歌曲激昂，具有煽动性，又有号召力，很快在小镇流传。

在一派“造反有理”的喧嚣声浪中，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动。木洞镇被改为“上游镇”，镇上有名的石堡街改为“反修路”，大坪改为“向阳坪”，新街改为“四清路”；镇上一些有名气的传统老字号店铺如“永茂商行”、“柳村园”都改成了“工农兵商店”或者叫“一食堂”、“二食堂”，镇上所有的茶馆通通关闭，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娱乐场所、藏污纳垢的脏臭之地！

有一天市里下来一些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外地学生，他们拿起剪子在街上巡查，扬言要对蓄长发、穿花裙子、高跟鞋的男女青年采取“革命行动”：要将长发剪去，男的推个“平头”，女的剪成齐耳短发即所谓“革命头”；要将花裙子剪烂，将高跟鞋砸掉后跟。他们站在正街的各个路口上，吓得镇上一些追求时髦的青年男女一时不敢上街。最后红卫兵们在永茂商店旁逮住一个外地姑娘，把她穿的花裙子剪成了破片，这个姑娘带着羞辱与惊吓，含着眼泪仓惶而去。

1966年8月底，木洞来了几个神秘的红卫兵。他们是首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鬼见愁战斗队”的学生，领头的是著名的渣滓洞烈士江姐的儿子彭云。彭云在重庆市第四十一中读高中时，曾随学校到木洞支农，住在我们巴四中学生宿舍，并与巴四中师生一起在苏家浩（现在称桃花岛）收割麦子。同学们都以能有幸见到这位著名烈士的后代而引以为荣，应学校广大师生的热情要求，彭云当时给大家做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1965年他考入哈军工，成了这所有名的“红色干部子女学校”的高材生。文革开始，彭云作为第一代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接着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文章，表达了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战到底、誓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然后马不停蹄地来到重庆这块洒满包括她母亲在内的共产党烈士鲜血的土地，进行煽风点火。

他们一行来到木洞，才知这里还是死水一潭。只见巴四中校门紧闭，冷冷清清不见一人（此时学校正放暑假，还未通知学生返校），没有一点外地大城市已较常见的文革造反运动风起云涌的迹象。于是，他们便找木洞镇上一些单位的青年团员进行串联，先后找到榨菜厂职工程光权，市管会（当时的市场管理机构）职工唐永康（外号唐九）、周祖惠（女），供销社职工龚天惠（女），中心校教师王周碧（女）等人，安排了一个时间在木洞供销社秘密开会。

在会上，彭云等人很严肃、紧张地告诉大家：中央出了问题，形成了两个司令部，有人想篡夺毛主席的权，中国革命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听到这些情况，青年们的心情都紧张、激动起来，一致表示要立即行动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投身文化大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 率先炮轰区委的“九三”事件

9月3日这天，青年团员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税务所职工)、龚天惠、程光权以及小学教师王周碧等鼓起勇气、打破情面，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他们在四张报纸上写了四个粗体大字“炮轰区委”，由4个人（具体是谁已记不清）各自用手牵开一张，在街上游行，顿时吸引了上百人的围观，还受到前来交公粮的水口公社农民刘世忠、张子辉、贾伯川等人的赞同附和与大力支持。大家汇合在一起，从正街向地处大巷子的木洞区委涌去，要求区委领导表态支持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区委主要领导避而不见，派出姓刘的组织干事出来挡驾。

刘干事代表区委表态：不允许各单位成立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在各单位内部进行，不许跨行业、跨单位成立组织，并且严厉批评唐永康等人今天的行动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非法活动，必须严肃处理。双方发生严重的争执。

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木洞的“九三事件”。

市管会唐永康、周祖惠和税务所王三富三人随即联名写出大字报，抗议区委粗暴压制群众的革命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木洞地区文革中第一张批判、攻击区委“政治错误”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人们争相观看，议论纷纷，影响在迅速扩散。

区委赶紧采取灭火措施，调动各种力量，对参与这次事件的人员进行围攻、批判，指责他们的行为是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攻击党组织的反党行为，并将“九三事件”定性为“九三反革命事件”，在镇上以市管会、税务所作重点，抓“带头闹事”典型。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三人被定为“首犯”，受到公开严厉批判，其他人员则在各自单位接受审查。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九三反革命事件”的所有参加人员都被迫写了检讨，承认错误；部分“骨干人员”如唐永康、周祖惠、王三富、龚天惠、王周碧等，还被送到涧上的箭桥拦河坝工地一带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轰动一时的炮轰区委的“九三事件”，没有多长时间，就烟消云散了。但后来批判镇压“九三事件”的“罪行”，要求为其公开平反，成了木洞地区各造反派组织共同的“革命要求”，既是造反“联合阵线”的政治基础之一，也是揪斗区委当权派的主要借口之一。

### 官办“校革筹”与“思想兵”

“九三事件”后，我们巴四中全校同学得到通知，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沉寂了一个多月的校园，又一次喧闹起来。

大部分的同学都按时返校了，我们毕业班的人缺席多一些，部分同学认为反

正升学已无望，便心安理得地在家务农或闲耍。

教职工结束了在青木关的集训，带着一身疲惫，心有余悸地回到学校。校长陈孔义及教师王治林、白云、张苏东、曾统均还在审查之中，回校后就被关进了学校设的“牛棚”内。

学校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由原来学校的政治教师刘老师主持学校的工作，学校的领导机构改名为：巴四中校革命领导筹备小组，简称“校革筹”。

新上台的刘老师，论学历、资历和教学水平，与其他教师相比都多少有些差距。但由于有一张共产党员和转业军人的金字招牌，才安排到学校当政治老师。也许是他历来政治立场坚定，在运动中又表现积极，这次摇身一变，坐到了学校领导的宝座上。

返校第一天，刘老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我们这次返校是搞文化大革命，暂时不复课，毕业班的学生安排，等到运动后期再处理，大家要在校革筹的领导下，积极投入运动，没有校革筹的允许，任何人不准外出！

在校革筹的安排下，同学们按班级成天关在教室里，由班上团干部组织学习“十六条”，学习报纸，学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那时，毛主席已在北京检阅了两次红卫兵，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已成燎原之势。我们却还像小鸟关在笼子里一样，感到心神不宁、坐卧不安。

几天后，刘老师宣布：我们也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同学们一阵惊喜，高兴得手舞足蹈。消息传出的第二天，巴四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就宣告成立了，战旗、袖章已经由市里统一制好，连夜派人送来。批准参加的同学全部都是贫农、下中农、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

我的家庭成份是“小贩”，没有批准参加“思想兵”，感到十分委屈。我找到刘老师说：我父亲解放前也出身贫雇农家庭，年青时为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流浪到涪陵城里给人“帮丘二”（川语，即为人帮佣，打工），学了门杀猪宰羊的手艺，混碗饭吃。临解放时才逃到木洞落脚安家，做一点贩肉的小生意，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小贩这个成份在旧社会也应算是城里的贫下中农，为什么我不能参加红卫兵呢？

刘老师对我爱理不理，他说：“小商小贩怎么能与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相比？再说，你本人的表现……”

下面的话虽然没有说出口，我已经明白了，在他的心目中，我还是一个“只专不红”、政治上不及格的人。

我后悔不该来自讨没趣，触了一鼻子灰。

“思想兵”战斗团的成立大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举行，加入“思想兵”的同学戴着鲜红的袖章，列队站在前面，一个个精神焕发，激动不已，人人脸上都是充满骄傲和自豪的神情。

没有被批准参加“思想兵”的同学，排在后面，没有发袖章，取名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简称赤卫军），算是外围组织。我也被编在赤卫军的行列，观看周围其他与我一样的同学，大家多少都有些自愧。

“思想兵”的头头，由“校革筹”指定六七级的黄家金同学担任总指挥，据讲他是一个贫协主席的儿子。黄家金激动地接过刘老师授予的战旗，迎风挥舞，鲜红的战旗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几个金黄色的大字分外醒目。

随着战旗的飞舞，“思想兵”一齐热烈鼓掌，掌声很响亮、很热烈，站在后面的赤卫军也不好意思地跟着鼓掌，但掌声并不热烈。

黄家金带领全体“思想兵”庄严地举起右手，面对毛主席像宣誓：“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巴四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体战士一定忠于您老人家，一定在您老人家的指引下，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把剥削阶级的旧世界彻底摧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镇上也成立了为数不多的“工人纠察队”。

“思想兵”和工人纠察队都是自上而下的官办组织。他们也打起造反的旗帜，实质上充当各级当权派的卫道士。哪里有当权派被揪斗，他们便出来解围。他们宣扬的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荒谬理论。他们的一切活动经费都由市里拨专款报销。

“思想兵”一出笼，就遭到造反派的强烈攻击。山城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思想兵，思想好，天天跟着市委跑！”

“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全家保皇，铺盖两床！”

后来大家干脆把“思想兵”戏称为“麻子兵”。

我们学校的“思想兵”成立没几天，就得到市里分来的二十几个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名额，往来全部费用由公家报销，有专人安排食宿，并配有专车接送，不必像其他串联的红卫兵那样去挤火车、睡过道，站上几天几夜受活罪。

对于一个山区的孩子来说，能够一下走出家门，到祖国的首都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可以说是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很多的同学连重庆城里都没有去过，在全校的师生中，到过北京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当全校师生看着这二十几个同学，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喜气洋洋地走出校门时，一个个都羡慕不已，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我们班的耿品禄、蒋国碧、谭志培三人，就在这些“最幸运的人”之中。此外，农中也有几个上京名额。

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我校“思想兵”赴京代表与80万红卫兵一道，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最高领袖的检阅。当晚，刘老师从北京发回加急电报：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校园里一片欢腾，师生们沉浸在幸福的暖流中，大家激动万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没几天，赴京的同学回来了，一个个成了骄傲的天使。

从此“思想兵”更加威风八面。根据上面的部署，他们将杀向社会，一场血腥的大抄家运动在木洞展开了。“红色恐怖”顿时弥漫在小镇上空……

### 官方主持的“思想兵”大抄家

1966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凉风习习，秋意浓浓，我接到学校“思想兵”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全校同学立即全部到校，有重要活动参加。

我急忙赶到学校，一进校门，就感到今晚气氛紧张神秘。只见操场上挂起一盏明亮的汽灯，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吴眼镜与刘老师正在操场一角低声交谈，一会儿又见吴眼镜掏出个本子，在上面比比划划，两人好像在商量安排什么事情。“思想兵”的大小头目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着，还有两个“思想兵”的战士拿着本子逐一登记到校人员的名单。这一切表明，今晚的行动非同一般。

晚上十点钟，刘老师召集全体人员在操场集合，简短地宣布了连夜召集大家到学校来的目的和任务。“思想兵”总指挥黄家金挺身站立在吴眼镜和刘老师的前面，大声发出号令：今天晚上我们巴四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杀向社会，搞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大行动，要大造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反，要大造资产阶级的反，要抄他们的家，端他们的黑窝！在行动中，大家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各行动小组，按照指定的对象，分头执行。没有安排行动的赤卫军同学，今夜一律不准出校！

其他没有获准参加行动的，还有许多镇上的同学，估计可能是担心他们与抄家对象万一有什么关系，怕到时抹不开面子，斗争立场不坚定。后来还知道，一个身为“思想兵”的团员女同学也没有去参加抄家，因为在事前安排任务后她“因事”先回家，结果“大人不让参加”。

各个抄家小组，像战士接到冲锋命令，在夜色的掩护下，迅速冲出学校，奔赴指定的阵地。刘老师和吴眼镜则留在学校坐镇指挥。

我不但没有资格去参加抄家的革命行动，这天晚上还暂时失去了行动自由，而不准我们走出校门的理由，竟然是防止我们暗中去给“牛鬼蛇神”通风报信！

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我和六七级戴光荣、曹选伦等几个被打入“另册”的镇上同学，在校园里来回走动，吹牛聊天，打发时光。没有去参加抄家的革命行动，大家多少有些失落感，情绪很低落，不免抱怨牢骚几句，尤其是戴光荣，愤愤不平的，气话中带了不少刺。

到了下半夜，又冷又困，单薄的衣服已挡不住阵阵寒意，不得不在双杠上做些暖身活动。刘老师出来巡视，见我们无事闲逛闲聊，不知怎么便点上我，安排与其他几个赤卫军同学去看管关押在“牛棚”受审查的“牛鬼蛇神”教师。戴、曹二人借机溜之大吉。我当时还自我感觉有些荣耀和感动：这下好歹有点剩余的革命行动让我去接受考验了。

好容易等到天亮，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去，沿途见到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一夜之间，镇上像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后一样留下一片狼藉，很多的家庭遭到了抄家洗劫。街上到处堆满了抄出来的家具、衣物、书籍、生活用品，乱七八糟一大片。那些被抄之家的主人，神色沮丧，愁容满面，呆立一旁，望着那些被抄出来的东西，茫然不知所措。他们由手执木棒、皮带的“思想兵”看管着，稍有不如意之处，就会遭到皮带、木棒抽打。

所有被抄家的对象，都是由镇上和派出所预先拟好名单，交给“思想兵”去



执行的。除了一部分是地富反坏、管制分子外，相当一部分是在单位上班的职员，这些人在民国时期有点资产，以后属于私营改造对象。经过公私合营改造，原来的企业或店铺被剥夺后，安排在商业部门上班。昨天他们在表面意义上至少还属于人民队伍中的一员，一夜之间天降厄运，现在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享受罪犯的抄家待遇，而且比那些已经明确了身份的阶级敌人还要被整得厉害。

整个镇上都惊翻了天。围观的群众在那些被抄人家的门前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像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为了体现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体现红卫兵的首创发明，各个抄家小组开始了现场的“活学活用”。他们给被抄之家的主人挂上黑牌，写上姓名、罪名，再用红笔打上一个大叉，让他们站在木凳子上、桌子上，向群众低头认罪。有的还独出心裁，把抄来的旧式衣服、瓜皮帽给他们穿戴上，让他们一手举算盘，一手举“账本”，做出地主老财剥削人民的造型，强迫他们像雕塑一样，长时间保持一个丑态不变，否则就挨皮鞭抽打。

学校旁边一喻姓人家，首先遭到了抄家。这家人开了一个副食店，店主外号人称喻麻子，待人很和气，平时生意还算可以，学校的学生们喜欢到店里去买东西。只因主人在民国时期是一个商人，据说有点积蓄，这次就上了抄家的黑名单。抄家的时候，将家中彻底翻遍，连后院一个水池的水都放干了来搜，也没有搜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店主不在，“思想兵”就拿他的女儿出气。那女子不到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华，人也长得十分漂亮，平时就招人注目。她被几个“思想兵”揪出来，脸上抹些黑灰，披头散发地站在家门口。几个恶作剧的“思想兵”，还把一些女人的内裤、内衣和一双烂鞋，挂在她的胸前，让她举一块纸牌，上面写着“资本家的大小姐——×××”，然后打上一个惊叹号，加上两个大字：“破鞋！”

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从来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过这般侮辱，她低着头，又羞又气，泪水不停地流着。

### 批斗“大特务”闹剧

石堡街有一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脸上有一伤疤的中年男子叫颜成才，平时靠敲打白铁皮、换锅锅底、配钥匙、修面盆维持生活。此人少言寡语，极少接触人，唯一的爱好就是下象棋，据讲棋艺还算上流。文革前，学校组织学生参观渣滓洞、白公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观看“美蒋特务罪行展览”时，有位同学眼睛尖，发现罪证中有一张国民党警察局逮捕长江电厂地下党员的黑名单上，有一校对员叫颜成才。这位同学的阶级斗争觉悟高，一下就想到镇上那个颜成才，莫非他是一个漏网特务？回校后，他立刻向派出所报案。天下同名同姓者甚多，谁知他的怀疑竟成了事实。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镇上的这个颜成才，确实是在伪警察局当过校对，鉴于他主动投案，又没有直接的人命，受到宽大处理，作为内部监管对象。派出所的人还透露，颜成才脸上的伤疤，是他在解放前夕，为逃避打击，自己毁容所致。

抄家运动一来，颜成才便由内部监管，变成公开批斗打击对象。好像是早有预感，他已做好应对抄家的准备。家里除了几样简单的生活用具，几床烂棉絮之

外，可以说是四壁皆空、一无所有，就连米坛子里的粮食，也只够吃上两三天。

他的老婆和孩子，冷漠无神地望着抄家的“思想兵”，一副无可奈何而又听天由命的样子。

“思想兵”认为抓到一个大特务，家里肯定藏有发报机，至少还保存有国民党的服装，反复地拷问颜成才，威逼他交出这些罪证。但任凭百般拷问，颜成才死活也不承认藏有这些东西，到最后，干脆低着头装哑巴，并不时抬起那张有伤疤的脸，瞅一眼革命小将，似乎有些蔑视意味。

整整折腾了一夜，小将们一点收获都没有。“思想兵”气得发怒了。天亮后，他们连拖带拉，把颜成才揪到门外，找来一张大桌子，让颜成才站上去，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做出投降的姿势，胸前给他挂上一块黑牌，上面写着“渣滓洞、白公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颜成才”。

听说颜成才是个暗藏的特务，镇上很多人都感到吃惊，不少大人小孩都跑来亲眼见识一下。大家对着他指指戳戳，七嘴八舌，发表议论。这个说：“看不出来，他还隐藏得深呢！”那个说：“莫看他现在这个窝囊相，解放前可是个腰皮带发叉、肩膀上扛花的角色……”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思想兵”令他自报家门。颜成才故意装糊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黑牌上的“罪名”：“我叫颜成才，颜成才就是我。我是渣滓洞、白公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渣滓洞、白公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就是我……”

他那有气无力的腔调，举手投降的姿势，配上那张丑陋难堪的面容，使周围的群众忍不住发笑，仿佛他真的就是一个杀人魔王落到了可悲可怜的地步。

颜成才这样反复念了多遍，“思想兵”有人决定改变方式进行现场审问。

一个“思想兵”担任审讯员，另一个“思想兵”拿起笔记本做记录：

“颜成才，你要老实向革命群众交待，江姐是不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回答得很干脆，群众一阵惊叹！

“许云峰是不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回答得仍然很干脆，群众又是一阵惊叹！

“小萝卜头是不是你杀的？”

“也是我杀的。”回答很肯定，部分群众有些义愤填膺了！

“用什么武器杀的？”

“我用杀猪刀杀的！”

群众先是一愣，随后一阵哄笑，看得出这家伙完全是在装疯糊弄人。

“思想兵”怒不可遏，大骂颜成才在胡说八道，侮辱革命先烈，罪恶滔天。于是，木棒、皮带一齐向他腿上乱打，随后又将他从桌子上揪下来，拳打脚踢，打得颜成才鬼哭狼嚎一般乱叫，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额角上都流出了鲜血……

打够了，又把他揪到桌子上向群众低头弯腰，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就这样足足折磨了一天，直到晚上，颜成才双脚已经发肿，失去了知觉，实在支持不住，从桌子上跌了下来，才让家里的人背进屋去。

## 丁雪松之兄被抄家批斗

在石堡街与新街的交界处，大码头旁边，普通的板壁门面里住着一户人家，主人是后来的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的亲哥哥丁玉枢。丁玉枢以前家境较好，经营布匹、丝绸生意，算是木洞八大富商之一。妹妹丁雪松年轻时就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几十年未曾回家。1949年后，经过公私合营，丁玉枢被共产党政府安排在镇上供销社的商店站柜台，卖布匹。

奇怪的是，尽管有个红色高干妹妹，丁玉枢在这次抄家运动中也未能幸免。当思想兵深夜破门而入之时，他简直惊呆了。

从丁玉枢家里抄出来的东西不外乎就是几件古色古香的旧式家具，几件质地很好的丝绸衣服、被面。还有一些精致的文房四宝，因为丁玉枢喜欢书法。这些都算不上是什么罪证。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他卧室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大坑洞，可容一人蜷曲着钻进去。

经审问，他交待这是他私人挖的一个家庭防空洞，还没有完工。

文革前，全国上下开始备战，各地大搞人防工程，随时准备打仗。丁玉枢看见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政府是不会首先考虑他们的安全的。亲身经历过日本大轰炸劫后余生的他，对战争的残酷记忆犹新。为了自身的安全，他决定在自己的家里挖一个防空洞，以防不测。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家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了起来。好在他家的后门紧靠河边，挖出来的泥土倒在河坝也没人注意。只是未曾想到还未完工，抄家运动袭来，就全暴露了。

“思想兵”突发奇想，把这个洞穴说成是隐藏敌特的设施，是为了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再不就是家中一定藏匿有巨额金银财宝，挖个洞穴就是用来暗藏宝物的。

他们对丁玉枢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大打出手，硬要他交出隐藏的金银财宝，或者说出洞穴的真实用途，可得到的都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答案。

“思想兵”决定打掉丁玉枢的威风。他们把丁玉枢揪到他家附近的万天宫前石梯上去“亮相”，扩大影响，动员、发动群众斗争。

万天宫，1949年后改作木洞税务所办公及粮店售卖、加工粮食的场所。它位居镇中心，地势居高临下，面对长长的街道，可以容纳很多人。文革中凡有重大的活动、集会，一般都在这里举行，被当地人称为“木洞的解放碑”。

丁玉枢被“思想兵”揪到万天宫最高的一层石梯上，面对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他咬紧牙关，面色严峻，两眼发出冷冷的目光，已是深秋时节，他那秃了顶的头上还冒着大汗。

“思想兵”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打倒丁玉枢！丁玉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一声高过一声，声声如雷贯耳，现场气氛十分激烈。

丁玉枢昂着头，没有一点服气的样子。一个“思想兵”小头目从背后伸手去按他的头，要他端正态度，把头低下去。倔强的丁玉枢不愿低头，将手臂往后一挡，正好顶在那个“思想兵”的胸口上，随后顺势一抬，只听一声尖叫，那个“思想兵”一下倒在地上，捂着手臂连声叫痛。

这时全场秩序大乱，主持会议的人急忙扶起跌倒在地上的“思想兵”，火速送往医院。有人急忙跑进税务所打电话，向派出所报案。一会儿派出所的警察赶到了现场，不由分说，将丁玉枢拷上手铐，当即关押起来。

批斗会没法开下去。社会上顿时传言纷纷，有人说丁玉枢会武功，用了一招什么拳术击断了别人的手臂；有人说是用的点穴术，有人说是用的暗器伤人，还有人说是用的气功……舆论越传越玄，倒给丁玉枢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那个负伤的“思想兵”送到医院后，第二天就出院了。他胸前吊了一根绷带托住右手，没几天就取了绷带，手臂根本没有折断，可能是脱臼，或者只是扭了气，不然恢复不了这么快。

这个“伤员”很快被安排回家休息，刘老师和“思想兵”的头头有令，不许打听他的伤势，也不许他接触其他人。

就在丁玉枢在万天宫挨斗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一位身穿草绿色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外地女红卫兵，那是由北京来重庆串联刚到木洞的丁雪松的独生女儿郑小提，千里迢迢来见舅舅，不想却目睹了这一幕，与舅舅连一句话都未说上，就悄然离开了。

丁玉枢随后就被送到巴县看守所，投进监狱，罪名是：毒打红卫兵，对抗文化大革命，一关就是三年多，后来才落实政策，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再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 “血衣与遗骨”事件

木洞在抄家运动中可说是奇闻百出。当时一件骇人听闻、轰动巴县、轰动全重庆市的“血衣与遗骨事件”就发生在镇上一个叫田仁逸的家里。

田仁逸是镇供销社“三八”商店的一个营业员，其夫蒋立全在民国时期任过巴县参议员，参加过民间帮会组织袍哥，1949年后他积极服从和配合共产党新政权的接管工作，有一种说法是他还颇受第一任区长邢厚安的赏识，曾被推荐上“西南革大”（西南革命大学，实为培训干部的短训班），但不知何故未去。随即，蒋立全被镇上明伦小学（原福音堂小学，五十年代后改称“新民小学”）聘用，在这里教书。“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天晚上政府开展统一行动，蒋立全在家被抓走，关押在镇人委（民国时木洞警察局原址），几天后在八洞桥附近的河沙坝公开枪决。据老一辈人讲，临刑前他神色自如，还在公审大会的主席台上讲了几句话，口里含着纸烟，向熟人打着招呼，被押解着走向行刑地。死后，尸体由家人收敛掩埋。

田仁逸本人没有直接的“反革命”罪行，且出身贫苦，又传说是被蒋立全强占为妻，丈夫被镇压后作为内控对象，安排在供销社当营业员。这次抄家运动，作为被共产党政府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属，她也在劫难逃。

“思想兵”贴出战报，宣称在她家中抄出了她隐藏的丈夫遗骨和血衣！这是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是阶级敌人仇恨共产党、妄图变天的铁证！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市、县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思想兵”总部、重

庆日报社都派人下来整理材料。

为了宣传抄家的成果，教育群众，“思想兵”还把“血衣”和“遗骨”摆在田仁逸家中展览，每天前去参观的人排成长队，络绎不绝。

我随着人群去过现场，看到田仁逸被“思想兵”限制在屋内一角，低垂着头，头发散开遮住了大半个脸。面对来一拨、去一拨的人群，她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屋内的一张桌子上摆着几张报纸，上面放有一截骨头，由于时间已久，骨头已经钙化，呈灰白色，分不清是哪个部位的，也不敢确定是否是人骨；骨头的旁边放着一件旧式的对襟汗衫，灰白色的，没有展开，胡乱地揉成一团，是否完整也看不出来。透过肉眼观察，汗衫已经发黄，很多地方起了霉斑。我还特地注意观察汗衫上是否有枪眼和血迹，但没有发现，只觉得有些地方颜色污暗一些，并有细细的孔眼，像是被虫子蚀过一样。

几个“思想兵”维持秩序，不许参观者触摸“血衣”和骨头。一个“思想兵”担任现场解说，给大家讲，“遗骨”是在田仁逸床上的床柱子里藏着的，是把床柱挖空了藏进去的，以便夜夜陪着亡夫而眠，时刻不忘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血衣”是在灶孔下面挖出来的，我看了一下墙角的灶膛，确实已经破坏，灶孔下面挖了一个大坑。

到现场参观的人都说“深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指着墙角的田仁逸大骂不已，有的还向她吐口水，恨不得将她撕成几大块。

但一些年纪大的人看后，却在私下议论，说那骨头不像是人的骨头，还有那件汗衫，像个儿童的衣服，见过蒋立全的老人们都说，蒋立全身材高大，不可能穿这么小的衣服。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那遗骨的来源，按一般常识，死者必须要入土掩埋，经过一段时间尸体腐烂以后，才能开棺取出骨头，作为一个胆小的妇女，又弱不禁风，她能干得了这事么？

“思想兵”大肆宣传抄家的成果，层层上报，没几天，“思想兵”总部的人就把“遗骨”和“血衣”带到重庆城里的枇杷山公园，参加全市红卫兵抄家成果大展览，并且放在显眼的位置，成为整个展览的一大热点。

从此以后，田仁逸一家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强大的社会压力把她儿子逼疯，三亲六戚也受株连。为了讨个清白，田仁逸也多次提出上诉，要求对“遗骨”和“血衣”进行鉴定。可每次的申诉，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受理。后来上面干脆回答：展览会结束后，两件东西不慎丢失了，找不到证据。今后再要上诉，就是翻案，定要从严惩处！一家人只好背着黑锅，夹起尾巴做人。

几年后，我问过她家的一个亲戚，谈到此事，他连连摇头，大喊冤枉。他说，抄家的时候很混乱，田仁逸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她都不知道这两件东西从何而来。他判断，可能是老鼠铺窝，不知从什么地方叼来的破烂衣服和骨头。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始作俑者的那几个当年的“思想兵”才最清楚明白。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能站出来说一句实话，帮助解开扑朔迷离的谜底吗？

## 批斗中出人命了

抄家运动进入到第三天，就出了人命案。

那天下午，一个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中年妇女被几个“思想兵”从正对小东门的一个巷子里揪到大街上。看样子，那妇女已经被折磨得浑身无力了，苍白的脸，显得那样憔悴，凌乱的头发，破旧的衣衫，看上去像个路边的乞丐。

这位妇女叫颜开悟，是镇上胡裕隆的儿媳妇，丈夫胡大泽在外地一所中学任教（改革开放后胡大泽调重庆教育学院，曾任历史系主任，是有名的近代史学者）。

胡裕隆在民国时期也算是木洞镇上的富商之一，办有面粉厂、裕大电灯公司（发电、照明），还兼营其它生意，热心地方公益，救济弱孤，捐资办学，我们学校巴四中的前身就是由他和几个富商出资筹办的。

由于家境较好，儿子胡大泽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因学习成绩优异，所在大学给予高材生称号，并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四所高校批准去作研究生，但未去。据说，读大学时，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字：约翰·大泽。中共执政后，胡大泽曾任木洞镇共产党新政权的第一任镇长，五十年代初在巴县获得过模范镇镇长称号，1956年保送到南京大学攻读近代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59年留校教书，1964年调回巴县第一中学（铜罐驿区）任教。

中共执政后，胡裕隆积极靠拢新政权，捐钱捐物，响应共产党号召，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后，被安排在食品厂上班，一家人安分守己，做事谨小慎微，但不料这次也被上了抄家黑名单，被当成“没有改造好的资本家”受到清理。在抄家策划者们眼中，他那有英文名字的儿子自然也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混进教师队伍中的异己分子。

“思想兵”横蛮无理地冲进胡裕隆家里，威逼他交出隐藏的黄金白银，还有儿子胡大泽的外文书籍（以便作为里通外国的罪证）。胡裕隆自然会矢口否认藏有这些东西。

“思想兵”当然不甘心，把家里反复搜查了几遍，也找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恼羞成怒，把一肚子气发泄在家具上。他们任意砸损家具，几把红木椅子顿时被砸烂。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兵”在一只高脚木盆中间的夹层里发现了金条，于是继续追逼，接连砸了一些旧式家具。

“反动资本家”胡裕隆是既不敢怒更不敢言，而一旁的儿媳颜开悟却实在是看不下去，忍不住与“思想兵”顶撞了几句，就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思想兵”立即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颜开悟，对她进行了百般凌辱，采取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准睡觉等方式。但“思想兵”还觉得不解气，于是扯着颜开悟的头发把她揪到大街上，当众亮相，围攻批斗。

小东门附近的街道上很快聚集起许多看热闹的人，我也在这些人群中，所以亲眼目睹了这场暴行惨案的发生。

他们搬了一根凳子，逼着颜开悟站上去，低头弯腰，向人民群众请罪。身体虚弱的颜开悟，头发被扯掉一大把，头皮渗出缕缕血迹，一站到板凳上就双脚发抖，身体打晃，满脸惊恐，虚汗直冒。“思想兵”认为还不过瘾，一个学生把颜

开悟猛推下来，众人再一把将跌倒在地的她抓扯起来，又加了一个板凳上去，强迫她站得更高点。

颜开悟这次费了很大的劲，怎么也抬不起酸痛沉重的腿，按“思想兵”的要求站到凳子上去。“思想兵”说她是装死狗，几个人抓住她的衣领，连推带拉，把她提了上去。

颜开悟站在两根重叠的板凳上面左右摇摆、东倒西歪，此时的她很难控制身体的平衡。一个供销社工纠队员正好路过这里，上前狠狠踹上一脚，和其他“思想兵”一起踹倒了凳子。颜开悟连人带凳一下倒了下来，头部重重地跌在街上铺的青石板上，抽搐了几下，便气绝身亡，惨死街头。

围观的群众惊叫起来：“不好了，出人命了！……”几个肇事者见势不妙，拔腿就跑了。街坊邻居自觉地围成一圈，保护现场。

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吴眼镜来了，装模作样地简单看了一下现场，没有拍照，没有做记录，更没有验尸，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就走了。

只见一个年轻女孩匆匆跑来，手里还提着一个提篋，见到颜开悟躺在街边惨死的样子，不由一下扑在尸体上，哭得肝肠寸断、眼泪横飞，提篋扔在一旁，掉出剪子、小刀（剔菜头用的）一类东西。这女孩可能是颜开悟的女儿或亲戚，大概是在中坝榨菜厂做“挑菜筋”的零工，听到消息跑回来的。这一凄惨的场面，令在场的一些人也控制不住地掉下了眼泪……

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伤心欲绝的女孩及家人将颜开悟的尸体抬回家里。

当晚，小东门一带的街上三五成群地挤满了群众，许多人从镇上其它地段赶过来，胡裕隆家所在的小巷子和小院更是挤满了人。大家纷纷在议论，都说颜开悟死得太惨了，死得太冤了！不知国法何在？天理何在？

这时，镇上却有人放出空气，说颜开悟是“畏罪自杀”，与抄家的红卫兵没有任何关系，舆论来自派出所，借此为施暴者开脱罪责，转移群众视线。

我目睹了在大街上批斗颜开悟整个现场情况，可以肯定地说：颜开悟绝对不是死于自杀！

死者尸骨未寒，又遭人污蔑攻击。我无法想像，惨遭不幸的这一家人是怎样度过这个悲痛欲绝、凄风苦雨的长夜的？！

第二天，在巴一中当老师的胡大泽赶了回来，简单地安埋了亡妻。送葬的队伍从我家门前走过，经过石宝街向小河边方向而去。我看见送葬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亲属参加，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更没有鞭炮，只有家人及亲属死去活来、呼天叫地的凄惨哭声。

胡大泽面对亡妻之灾，表现得既无奈又很坚毅。他可能心里很明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纵有血案冤情也无法向谁申诉，也可能还受到某些压力，所以处理完丧事后，就悄然无声地离去了。

### 我庆幸没有资格参加抄家

这场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抄家运动，持续了一个星期。时间尽管不长，但

对于受害者来说，灾难却是巨大的！他们除了精神上受打击、身体遭折磨、人格受侮辱之外，经济上也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大多数被抄的家中，家具被损坏，门窗被砸烂，衣物被抄走，一些值钱的字画、古董下落不明，连锅碗瓢盆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具都被毁坏不少。我家对面一个原佛亨轮船公司主要股东之一的陈德璋家里，被“思想兵”怀疑藏有海外存款，硬是把地皮都挖去了一层！

那些被抄出来的家具、衣物、古玩等等，全被当成“四旧”物品没收。为了扩大影响，抄家行动的组织者和“思想兵”从中挑选出部分物品，在万天宫斜对面的二食堂举办了“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每天前去参观的人排成长龙，一时盛况空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又出现了丁雪松女儿郑小提的身影，她事隔不久又一次来到木洞，依然还是一身红卫兵的装束。经人提醒，负责解说的“思想兵”知道那个“对抗运动”的“打人凶手”丁玉枢的外甥女来了，便故意提高了声调，对着人群大声进行解说。但郑小提始终保持着淡然的表情，一言不发地随着人流观看着。

抄家告一段落后，大件的衣柜、家具、分别存放在各地段（居委会），贵重小件物品则集中堆放在区委的一间屋子里。由于整个抄家过程混乱无序，物品的清点登记也比较马虎随意，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趁机浑水摸鱼，大发抄家的不义之财，一些金银首饰等贵重小物品，落入到一些贪婪之徒手中。

看到抄家这样的野蛮行为和后果之后，我才不再因被剥夺了参加这种“革命行动”的资格而后悔，并有些暗自庆幸，没有卷入那些让个人良心蒙上污点的暴行。现在想来依然感到很庆幸——凭我当时的年轻幼稚，对革命的热情偏激，以及渴望证明自己进步、洗刷“只专不红”的急切心情，真不知也会跟着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 三个南下学生遭到驱逐

校革筹画地为牢，“思想兵”一统校园。他们严密封锁外界的消息，不允许师生们随便外出，更不允许外来串联的学生迈进校园一步。

可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红卫兵的大串联、大点火势不可挡。有最高统帅的支持，有中央文革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红卫兵如虎添翼、所向披靡，从北京一路顺风杀向全国各地，所到之处，如电闪雷鸣，似洪水猛兽，小小的一个县区小镇的中学岂能挡住这股狂流。

10月的一天，校门口来了三个外地的串联学生，两男一女，都操着北京口音，穿着最时髦的红卫兵服装，胸前戴着闪亮的毛主席像章，臂上的红袖章鲜艳夺目。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此时正在校门口向一些同学了解学校的情况，向大家介绍首都及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形势，鼓动同学们要起来造反，到外面去大串联。

南下学生的话很有煽动性，很多同学都跃跃欲试，但又担心校革筹不同意。南下学生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胆小怕事，要自己解放自己，打破束缚革命师生的条条框框。你们要赶快行动起来，到北京去，那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毛主席在那里等着接见你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学们，不能再犹豫了。”

我和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向他们反映：运动初期，工作组支使人搞毕业生的鉴定，很多同学的政治都不及格，毕业鉴定至今也没有公布……

南下学生听了，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那是极端错误的作法，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中央已经下达了文件，凡是运动初期整学生的材料，都是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白专道路”的学生，一律要平反。北京的大、中学校都这样贯彻执行了，你们不要害怕。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同学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一阵轻松。

南下学生接着讲：“你们这里死水一潭，保守派掌权，真正的左派还没有站出来，群众没有得到发动……”

他们的一番讲话，顿时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打开了思想的闸门，点燃了胸中的激情。一群本来就敢想敢干的青年学生，谁不想去闯闯世界，谁愿像小鸟一样成天关在笼子里？

聚集在南下学生周围听演讲的人越来越多。南下学生从挎包里拿出一些花花绿绿的传单、宣传资料，分给大家。同学们争相索要，拿到传单的人，如饥似渴地看着。

这时，刘老师带着几个“思想兵”头头来了。他们走到南下学生面前，用轻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几位不速之客。

“你们从哪里来的？”刘老师开始进行盘问。

三个小将根本没有把这个无名小卒放在眼里，非常傲慢地回答：“我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

刘老师触了一鼻子灰，忍了一下，然后加重语气：“到这里来干什么？”

“进行革命的大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把介绍信拿出来看看！”刘老师像查户口式地喝问。

“哈、哈哈……”

三个红卫兵一齐放声大笑起来，也许是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问得太荒唐了，所以引起他们大笑不止。

“什么介绍信？搞文化大革命还需要介绍信？请看这个，它就是走遍全国通行无阻的介绍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的介绍信！”一个瘦高个的南下同学得意地指着手臂上的红袖章，自豪地回答。

刘老师一连碰了几个软钉子，心里早就不舒服，这下他沉不住气了。他把脸沉了下来：“对不起，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不欢迎你们来当救世主，不需要你们来指手画脚。本单位的问题，本单位解决，请你们离开！”语气非常强硬地下了“逐客令”。

几个南下学生，视自己为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一路通行无阻，所到之处都被待若上宾，没想到会在这个小镇上受到如此怠慢和轻蔑，他们气愤不已。那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当即冲着刘老师说：“你们这里太落后了，太保守了，完全是

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我们要回北京去，给中央首长汇报，我们要拿起无产阶级的千钧棒，彻底打碎这个保守阵地，开创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天地来！”

南下学生还在滔滔不绝地争辩，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刘老师害怕影响扩大，便假意请他们到办公室去谈。随即给几个“思想兵”头头一个眼色，他们便上前挟持着三个南下学生进了校门，走到一间屋里，随即将门关上。

刘老师组织一些人对关在室内的三个南下学生训斥、围攻，大耍地头蛇的威风，但这三个人却一点没有惧色，慷慨激昂地大声辩驳、据理力争。也许他们觉得，被保守势力围攻、关押，是他们的骄傲和光荣。他们手挽手，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随后又深情地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歌声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悲壮，透过窗户传了出来……

很多在校的同学们，包括“思想兵”的同学都为之感动了，他们围在小屋周围，久久不愿散去。

夜幕降临了，三个南下学生还被关在屋里，尽管又饥又饿，但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一会儿背诵毛主席语录，一会儿唱革命歌曲，一直坚持到午夜时分。

快到下半夜时，刘老师叫人打开房门，把三个南下学生放了出来，责令他们马上离开。三人不愿就这样被轻易打发走，还在那里争辩、抗议，要讨个说法，一群“思想兵”骨干将他们轰出了校门。

第二天，这三个南下学生在镇上贴出了大字报：《向木洞地区的走资派、保皇派开火》，文字不多，措词严厉：我们是首都南下串联的红卫兵战士，来到木洞地区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不料却遭到一小撮走资派操纵的保皇组织的非法围攻、关押，失去人身自由长达6个小时。这是严重的政治迫害！为此，我们特向木洞地区的走资派及保皇派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勒令你们公开赔礼道歉，向革命小将低头认罪！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彻底砸烂你们的狗头！

但大字报贴上墙后，学生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围观群众进行充分的控诉和宣传，很快就遭到镇上组织的一群地段妇女积极分子的围攻，她们高声吵骂，将大字报撕扯了下来。这些婆婆、妈妈们口沫飞溅，指指戳戳，推推搡搡，有的还拿着“响竿”（当地撵家禽的一种工具，下端破成几片的细竹竿）挥舞着，把这三个“秀才遇到兵”的革命小将一路轰赶着，要他们“滚出木洞”，还不准他们到码头等候轮船“安逸地离开”，而是将他们驱逐到了小河边，逼着他们过河向西落荒而去。

## 学校失控了

从这件事发生后，学校开始失控了。不论是“思想兵”还是一般同学，都已人心浮动、坐卧不安，都想要冲出校园去搞大串联，去见大世面。尽管刘老师还在放出语言恐吓同学们，说不听招呼私自外出的同学要放到运动后期当成右派处理，但已经没有人惧怕了。

巴四中，或者说，整个木洞的形势，就像是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

会引燃一片烈焰。而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又岂止是火星！

刘老师权力失控，“思想兵”逐渐停止活动。根据上面的指示，关在学校“牛棚”里的五个“牛鬼蛇神”被释放出来，恢复了自由。

校园里又一次沸腾起来。同学们显得格外兴奋，大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恨不得一步就飞出校园，到北京去，到各大城市去，到外面去“经风雨、见世面”，亲自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去练就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再说，在积极投身运动的同时，还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串联，何乐不为？！

大家开始了自由组合，仅仅三五天的时间，全校就共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个外出串联小组，并立即忙碌地准备出发。

我和班上平时几个相好的男同学也组成了一个串联小组，大家聚集在一起，雄心勃勃地拟定了一个串联计划，精心设计了一条串联路线，同时还推荐我和谭志培当队长，我们两个乐意地接受了。

经过两天的准备，带着简单的衣物，怀着壮士出征般的心情，我们出发了。

---

【史林一叶】

## 话说涪陵文革的特点

罗成胜

按：本篇是本刊出题约作者在其博客文章的基础上另写的。作者罗成胜，1946年生，四川涪陵人，文革爆发时为涪陵第一中学青年教师，后为当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1967年“二月镇反”前夕，涪陵群众组织分裂成“忠实派”和“红卫派”后，任“忠实派”（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总负责人。1967、1977年两次分别以“现行反革命”、“帮派骨干”罪名入狱。其详细经历及有关涪陵地区文革历史的回忆可见其网易博客：<http://cqflbwww.blog.163.com/>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cqflbsjs>

其实，后人看历史一般不外两个视角，一是用望远镜看历史，一是用显微镜看历史。虽然在这个时代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来研究历史。

我则以为，只有我们既用望远镜看历史——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做出错误的结论，同时也用显微镜来看历史——这样才不至于丢失大量珍贵鲜活的历史细节，才能看清历史发展错综复杂的真相，分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特点；只有当你用显微镜将历史还原，你才能看到鲜活的历史，你才可能对历史做出合乎当时历史背景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也只有用显微镜来看历史，才不至于使历史变得只剩下一堆简单枯燥的概念和一些干巴巴甚至有些武断的结论。

时下的中国，和这个世界一样，是多元的社会，因此，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看法有多么不同，真相却只有一个——哪怕就是面对错综复杂的

文化大革命，各派曾经不惜用石头、棍棒、钢钎、机枪大炮甚至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来争议，但真相仍然只有一个。而真相的揭示，更多的要靠显微镜来查看那错综复杂的历史细节。

正是基于上面的认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涪陵文革的特点。

现在的重庆市涪陵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四川省的一个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当年的涪陵地区负责管辖涪陵、丰都、垫江、石柱、南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等十个县；当时的涪陵军分区直接管辖所属十个县的武装部。所以，涪陵地区所在地的文革实践，对所属十个县具有最直接的影响。

毫无疑问，涪陵地区的文革和全国各地的文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由于一些只有涪陵才具备的特别元素，使涪陵文革具有它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则对涪陵文革及涪陵文革的当事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不至于引起误解，我在这里还是先啰嗦几句，说说我在拙文《我的造反生涯》中早已表明的，我回忆和反思我的文革经历的基本态度。

我必须承认，在涪陵文革历史里我是一个处于风口浪尖的人物，我做过与涪陵“贸派”对立的涪陵“忠实派”红卫兵的总负责人（即所谓红卫兵司令），因此不管我自认为动机是多么“纯正”，也不管在所有的具体行为中是自觉或不自觉，我都对那场历史浩劫起过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坏作用；虽然我也在其中遭受过打击，遭到多次残酷的批判斗争，甚至两次身陷囹圄，但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执迷不悟地“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正确的”，并“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来没有从制度、体制的角度去批判性地进行过反思。

所以，对于历史，总的来说，我是欠账的。也正是从这一基本的判断出发，我再次表明，我对自己文革回忆的总要求是：即使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但绝不能说假话，作为亲历者，为了不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要写真文革；绝不能只想自己所遭遇的冤屈和不公，更不能因此而文过饰非，甚至自我粉饰，自我陶醉，而要尽自己的觉悟程度反思，而且是真思索。

## 涪陵文革的概况

还是先让我们用望远镜看看涪陵文革。

在望远镜里，你会看到，涪陵文革和全国各地的文革，特别是和全国的那些中小城市以及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中小城市的文革进程差不多。而笔者亲身经历了它的全过程（详见笔者在网易博客中全文连载的拙作《我的造反生涯》）。

文革初期的1966年“十六条”下达之前的7、8月，批“三家村”；然后联系实际，将矛头对准教师，在校内发动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然后全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用暑假分别集中学习，他们中的所谓“权威”（教书教得好，在学生中威望高，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点历史问题者）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开批判会，批斗会，甚至开所谓的“公判大会”将其中所谓“问题严重”者逮捕起来；然后组织“官办的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矛头对准

所谓“封、资、修”文化，对准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1966年“十六条”下达之后的9、10月，开始有外地造反派学生，如重庆“八一五”、成都“红成”、甚至后来还有“首都三司”（北京清华、北农机）的造反派红卫兵来涪陵串联，发动学生造反；到了1966年的11、12月，涪陵的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有很大力量了，工人的造反组织也在红卫兵的发动之下雨后春笋般组织起来，并已经普遍开花，将造反的矛头对准了地、县各级党政领导，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到12月下旬，原来由地、县党政当局组织的“官办红卫兵”“官办工人纠察队”的总部，涪陵“383联络站”被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的工人组织摧毁，涪陵成为造反派的天下。其中，“红贸军总部”，全称为“涪陵红色贸易军革命造反总部”——也即是后来涪陵文革中长期对立的两大派之一的“贸派”（也称“红联司派”）的核心组织就是在1966年12月24日成立起来的。

到了1967年元月，全国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开始全面夺权，此时，涪陵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基本上与全国的进程差不多同步了，涪陵的造反派也于1967年1月底2月初开始了全面夺权；1967年1月底由“涪陵红贸军总部”和涪陵地区邮电局的“涪陵红色邮电军”（当年邮政、电信没分家，统称“邮电局”）等部分造反派组织发起，有绝大部分涪陵地、县造反派组织参加、并得到涪陵军分区支持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立了。

接着，这个短命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成立大约半个月后（1967年2月11日）就被当时涪陵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卫总部”以“联合司令部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官办组织”为由砸掉——在此之前三天，1967年2月8日，后来成为涪陵文革中长期对立的两大派之一的“贸派”（也称“红联司派”）的核心组织“红贸军总部”也被“红卫总部”以同样的理由砸了——并从此开始了涪陵两大派的分裂和对立。

由于当时涪陵支左部队只有涪陵军分区的机关警卫连队和军分区直属独立营926部队，而当时的军分区是支持“红贸军总部”的，于是，在接下来的“二月镇反”运动中，反对“红贸军总部”的、在涪陵造反派中占有很大优势的“涪陵工人造反总部”、“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涪陵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涪陵红卫兵红卫总部”、“涪陵政法公社革命造反战斗团”等组织被取缔，其组织的头目纷纷被抓进监狱，来涪陵串联发动造反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被武装驱出涪陵。

——到这里为止，涪陵的文革进程和其他各地，甚至和邻近的重庆都差不多，无特点可陈。

接下来，1967年4月初，在“安徽五条”（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中发〔67〕117号）传到涪陵后，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开始恢复；中旬，五名在“镇反”中被抓的造反派代表（笔者是其中之一）由中央文革直接点名、并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下达；涪陵两派矛盾加剧，

开始发生武斗，特别是在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即“涪陵五条”）下达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所属 8342 部队参加并主导了涪陵的支左工作（当时的优先考虑是为了保证“816 工程”即核洞建设的安全及不受干扰），涪陵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然而，与全国的大形势一样，涪陵武斗开始升级，先后发生了“6·19”、“7·5”、“7·13”等大型的、双方都使用棍棒、钢钎、大刀等作为武斗工具的、双方都有死伤的武斗；直至发展到 1967 年 8 月 5 日由“贸派”实际总负责人赵树金一手策划了抢劫涪陵军分区军械库，“忠实派”也在支左部队支持下拥有了枪支（据当年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公开讲话中称，给涪陵“忠实派”发枪是报请中央批准的），两派武斗升级到使用枪支弹药，于是有了“8·8 海战”、“8·11 贸派袭击解放军”、“8·14 忠实派反击战”将“贸派”赶出涪陵城，“贸派”在赵树金的主持下，在退出涪陵城之后的几十天里杀“俘虏”、杀农村中不同观点的群众；而“忠实派”则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经过“江南战役”、“江北战役”，最终于 1967 年 9 月底，在经过攻占“贸派”最后占据的丰都县栗子寨后，在经过最激烈的丰都县黄沙坝一战后，将“贸派”组织全面摧垮。

在“贸派”组织被彻底摧垮之后，“忠实派”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在经过“大批判”、“大联合”之后，成立了只有一派掌权的各级“革命委员会”；

直到 1969 年，在“贸派”组织中一些不服输的人员跑到重庆，并在重庆“八一五”支持下，在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之后，终于在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后期，“贸派”（“红联司”）被中央承认为“革命组织”，于是“贸派”的一些新的代表人物（作为一派群众组织当时已经不存在）被作为群众组织代表“补台”进入涪陵各级革命委员会。

这就是我们用望远镜所看到的，1966 年夏～1970 初的三四年间涪陵文革的概况。这一过程和全国的文革进程差不多：最先从执政当局整群众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广大群众在“伟大领袖”的“造反有理”和“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伟大号召”之下，将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搞得瘫痪下来，并由造反的群众夺权；为了大局不乱，军队不得不介入控制局势，而面对因夺权发生分裂的两派群众组织，军队不可能将“一碗水端平”，于是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就发生了；两派的武斗升级了，两派都使用枪支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群众甚至支左的军人都有更多的伤亡，局部局势一度几乎失控；但在涪陵驻军的强力干预下，“贸派”在组织上被摧毁，涪陵实现了“一派掌权”；由于被打垮的“贸派”一直不服气，于是最后由中央出面，承认“红联司”（即“贸派”）为革命群众组织，并硬逼两派联合（不服从的头头以办学习班自己检查、大会批判、甚至被定为“坏头头”抓进监狱），继续由涪陵驻军控制大局，造反派也从此退出舞台。

但是，如果我们用显微镜来看涪陵文革，你就会发现它更多更生动的细节，

甚至会发现它具有和其他地方不同的特点。

### 涪陵文革的特点

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涪陵文革的特点。

首先谈谈涪陵文革中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各自的特点，特别是“贸派”（即“红联司”）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必须明白并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由于1967年全国全面夺权，原有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已经瘫痪，而1967年1月底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得不正式介入支左以控制局势，所以就全国范围来说，地方各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直至各系统单位）的合法行政当局就是指实际控制各级各地局势的支左部队及其领导机关。而对于涪陵来说，当时的合法行政当局在中央一级即当时的中央文革，省一级即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1968年5月28日后即为四川省革委），地区一级就是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和1968年5月16日后的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涪陵“贸派”，作为一个拥有上万人的群众组织，在当时的特殊时期，其存在的合法性除了1967年2月到6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得到当时的合法行政当局承认外，一直到1969年12月，整整有两年半的时间都不被当时合法的行政当局所承认，这一点和当时同属四川省的重庆、成都都不一样。

先说1967年4月中旬到5月初，中央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时（那次中共中央发了“四川十条”），“贸派”没有代表受邀参加北京的会，中央文革、周恩来在几次会议上都讲了重庆、成都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各地区的问题由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解决。”

而1967年6月17日，成都军区竟然发了一个《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即“涪陵五条”附后），“贸派”的“保守组织”性质被成都军区正式确定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涪陵五条”，于是涪陵的支左部队按照成都军区的决定，将“贸派”作为保守组织对待；于是在涪陵1967年7、8、9月的大规模武斗中，用涪陵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名义所发的几十份声明、公开信等正式公文中无一不是要“贸派”解散其组织，要“贸派”的一般成员和“一小撮坏头头划清界限”；于是就有了驻军支左部队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以宣传贯彻中央指示收缴武器的名义，用“赶鸭子”式的方式（当时涪陵支左领导小组领导多次对我这样讲过）摧垮“贸派”组织——也即被“贸派”称为“围剿红联司”的行动。

再说1968年3月中旬到4月下旬，中央第二次解决四川问题时（那次先后有“3·15指示”和“4·27指示”），“贸派”仍然没有代表参加北京的学习班，中央文革、周恩来在几次会议上都只讲如何解决重庆、成都的两派的武斗即联合问题，会上会后成都军区及四川省革筹的领导都明确表态，“贸派”组织不能再恢复，不承认“贸派”组织存在的合法性。

于是，就有了在“贸派”被彻底摧垮后完全是一派的所谓“大联合”“三结合”，并经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批准成立了只有一派群众组织代表进入的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及按同样的原则组建的涪陵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从而在整个涪陵地区从1968年下半年起开始了真正的“一派掌权”。

据可靠的文字记载，1968年8月24日成都军区在重庆召开的川东片区支左工作会（有54军、重庆军分区、涪陵军分区、万县军分区、达县军分区、江津军分区领导参加）上，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副政委谢家祥仍然如此表态——谢家祥说：“对群众组织，已经垮了的，就不要扶持恢复。……涪陵‘红贸’组织没有必要再承认，……昨天张（国华）政委也这样说。”梁兴初接着插话说：“组织不能承认它，群众回到各单位去联合。”

所以，一直到1969年11月初到12月底，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时，由于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仍然有效，那个会议开始时“贸派”仍然没有资格派出代表参加北京的会。我当年的笔记记录是：“会议前十多天，涪陵只是一派的去，而且当时四川省革委核心小组的同志也肯定涪陵只有一派（谢家祥曾在涪陵组讲过两次），后来周总理表态要承认以后，省革委核心小组方才又统一口径做工作，涪陵红联司即派出两名代表（张晓和黄年福）赴京。”（见我的网易博客《第三卷〈我的造反生涯〉（69）——“贸派”组织的恢复（3）·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京西宾馆会议》一文）

目前几乎所有谈及涪陵文革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特点。要知道，这既是涪陵文革的特点，也是涪陵文革区别于重庆文革和成都文革的关键所在：重庆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打得全国出名，成都的“红成”派和“八二六”派也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也打得非常厉害，但这些对立的两大派都是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文革承认的“革命组织”；而“红贸”派则是由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四川省最高行政当局成都军区发文（即“涪陵五条”）认定的“保守组织”。

当然，必须明确——也正如我在我的博文中表明的那样：“历史已经证明‘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有公正性的文件。”“那个‘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备正义性的决定。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正义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正义即公平。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这一原则，‘贸派’就应当平等地享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持；进一步说，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根本不应该将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样对立的两大派。”（见《我的造反生涯（35）》）

1967年9月底，当时被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定为保守组织的涪陵“贸派”（“红联司”）的武装力量在丰都栗子寨被更加强大的武装力量摧垮，“贸派”组织就此集体溃败；“贸派”中的少数人逃到了有“八一五”派支持的重庆，更多的人则是被俘押回涪陵后，因不堪虐待而逃离涪陵到了重庆。这些到了重庆的



“贸派”人员重新打出涪陵“红联司”的旗号，并积极开展活动。

一直到1969年12月底，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并发布“12·25批示”为止，“贸派”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政治生存空间、恢复涪陵“红联司”组织的合法性而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在为推翻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而进行抗争中，重庆成了“贸派”的基地。

“贸派”最终取得成功。涪陵“红联司”最终被周恩来亲自宣布承认为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最终被推翻。可惜的是，对于“贸派”群众这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在所有的涪陵“正史”里没有一个字的记录，更加叫人无法理解的是，在2004年出版的《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 11. -1978. 11. ）》（2003年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编）里，连1969年12月25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69）87、88号文件，即被称为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批示”——那可是“贸派”广大群众自1967年6月起两年多来最拥护的中央文件，也没有一个字的记录；相反，根据被这两个文件否定了的“四川十条”和由成都军区颁发的“涪陵五条”却可以在这个《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 11. -1978. 11. ）》里找到记载。

其实，从对历史负责任的角度去思考，“贸派”的广大群众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在这两年多里所坚持的斗争是为追求正义而进行的抗争，因此，他们的行为也是值得称赞的；尽管他们的有些做法和策略是有问题的，尽管我当时也是完全站在和他们对立的一面，是和他们对立的“忠实派”的重要头目，并竭力去阻止他们的这种抗争。

我现在分析起来，“贸派”之所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不为当时的合法行政当局所承认，原因应该很多：

比如，1967年“二月镇反”前夕被驱逐的来涪陵的“首都三司”十来个红卫兵的作用——据我所知，参加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的那次会议的五个涪陵造反派代表（包括我自己）人选就是他们向中央文革提供的；

再比如，作为“贸派”实际总负责人赵树金的个人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赵树金是1966年11月（当时涪陵的造反派已经在开始组建造反的组织）才从涪陵军分区转业到涪陵地区商业局任政治部主任的13级干部，其级别和当时涪陵地委书记一样——在当时他犯了“当权派直接插手并参加一派群众组织”的大忌；更何况他一手策划了在涪陵最先抢夺涪陵军分区军械库枪支弹药，导致涪陵武斗升级；更不用说他还亲手签字批准杀了33人并因此在1969年初即被判死缓等（关于赵树金的情况在我的多篇博文中都有记述）。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涉及到当时特有的涪陵支左部队的组成——这也是我下面要说的涪陵文革的第二个特点。

涪陵支左部队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342部队（即工程兵第54师），这是一支曾修建了酒泉核试验基地的部队，直属当时的中央军委工程兵总部；该部队两万多官兵于1967年初至1968年底先后进驻涪陵，其任务是要在涪陵县白涛镇乌江边的崇山峻岭开凿山洞，修建神秘的“816核洞”以建设原子能反应堆，该工

程是“最高领袖”批准的、被中央军委视为三线建设重中之重的工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为了保护施工的安全环境，根据中央军委和工程兵总部的命令，部队参加并主导涪陵地区的支左工作，对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部队副政委黄鹤寿（后升任政委）担任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涪陵文革的历史进程表明，这支支左部队在涪陵文革最激烈复杂的1967、1968那两年里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对涪陵两派的命运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涪陵支左部队的第二部分是团部设在原涪陵地区秀山县的成都军区独立团，其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由于这支部队由涪陵军分区兼管，所以军分区首长的态度对其影响很大。

第三部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军分区机关及其所属的独立营，其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926部队，总人数不到一千人。

至于涪陵地区各县的支左则是由涪陵军分区所属各县的武装部及武装部所属的县中队负责（当时还没有武警部队，包括涪陵专区监狱在内的涪陵各县监狱、看守所都是由独立营或县中队的军人执勤）。

因此，从隶属关系上说，涪陵的支左部队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即一部分是隶属中央军委工程兵总部的8342部队（有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实际军人最多时达两万），另一部分则是隶属于成都军区的涪陵军分区（师级机关，但实际能指挥的兵力有限）。

这就是当时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的七位首长：

黄鹤寿（工程兵 8342 部队副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李畔（涪陵军分区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永言（涪陵军分区代司令员、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任成宣（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杨登基（涪陵军分区副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李华禄（工程兵 8342 部队所属 8042 部队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薛春茂（成都军区独立团 7822 部队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军队的事情当然是用实力说话。所以，当时还只是师副政委且是1942年才参加革命的黄鹤寿被任命为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5月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而1938年就参加革命并在延安抗大毕业、军内职务早就是师（级）政委而不是副政委的李畔只能被任命为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1968年5月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也只能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虽然这样的安排好像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安排才维系了整整两年时间里涪陵的一派掌权；也正是这看似不合理的安排才造就了那既极具戏剧性同时也可叫做奇迹的一段涪陵文革史。

这就是涪陵文革的第二个特点。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人们，决不可小视工程兵8342部队及其支左的首长涪

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这支建造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部队是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的，而工程兵总部的司令员是陈士榘上将，也就是说，这支支左部队在隶属关系上成都军区管不了，而且其直接上司的军衔比成都军区的最高首长张国华（中将）、梁兴初（中将）都要高。我在那两年就不只一次听到黄鹤寿政委及其身边的秘书等军人说过“梁兴初算什么”、“成都军区管不了我们”、“我们可以通天”等语。

由于这支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涪陵的“二月镇反”，所以该部队是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的精神介入涪陵支左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接受支左命令的那一天起就是被要求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支持涪陵造反派“忠实派”，瓦解涪陵的保守组织“贸派”。

你完全可以得出如下合理的推断——由于这支部队介入并主导了涪陵的支左，所以它处于这样一个占据优势的地位：该部是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支左，如果支对了，有成绩，而如果支错了，成都军区有责任——因为是按你的命令在办；更重要的是，即使有错，也不能由成都军区来评判（或者不会听成都军区的评判），因为该部不属成都军区管辖，更何况其上司比成都军区最高首长（中将）还大（上将）。

正由于成都军区管不了黄鹤寿，所以梁兴初可以随便骂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畔，但绝不敢轻易批评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黄鹤寿的后台是上将陈士榘，而梁兴初则只是中将，正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何况黄鹤寿的部队当时在涪陵有兵力两万，涪陵军分区全部兵力（加上各县县中队）不过三四千！——而“贸派”要想被承认，只有成都军区废除“涪陵五条”，这也只是你成都军区的错误，与我工程兵总部和支左的工程兵8342部队无关。

以后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前面我所谓的合理推断。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导致了“贸派”迟迟不被承认，直到1969年底，在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京西宾馆会议的后期，才由比成都军区和工程兵总部都更高一级的中央，由周恩来出面摆平了此事：成都军区承认自己错了，废除“涪陵五条”，由周恩来宣布涪陵的红联司也是革命群众组织，而成都军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工程兵总部将在涪陵支左有功的黄鹤寿由副政委提升为政委；所以才有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只得把更大的怒气向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发泄，因为李畔在涪陵支左时犯了错误（李畔为此在1969年的中央“12·25”批示下达后三个月就被撤职，被闲置在成都军区两年，直到1972年梁兴初因被中央定为“上了林彪贼船的人”倒台以后，李畔才出任西昌军分区政委）——而当李畔正在1970年的中央学习班为涪陵“剿匪”问题做“请罪”检讨的时候，领导涪陵“剿匪”的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却经批准担任了中共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

### 涪陵文革特点对涪陵文革进程及当事人的影响

其实在我上面说涪陵文革的特点的同时，已经把这些特点对涪陵文革的进程及文革当事人的影响做了不少记述，如涪陵“贸派”之被定为保守组织并迟迟不

被恢复其合法存在的地位，如涪陵文革大武斗（特别是所谓“剿匪”）的基本情况，如涪陵文革当事人黄鹤寿、李畔的不同待遇等等。对此我再作如下两点补充。

首先谈谈涪陵文革的特点对造反派（也称“忠实派”或“涪陵二七”）的影响。

无疑，涪陵所特有的情况，对“忠实派”非常有利。“忠实派”的组织合法性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当局的认可，因此其组织成员在心理上没有政治压力，而且在摧垮“资派”之后的“大联合”、“三结合”等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中都得利不少，直接导致了在全国都少有的造反派在1968-1969年里真正意义上的“一派掌权”：造反派的各级头头（只要是没有家庭出身、杀人等问题者）都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并握有实际权力——由于在涪陵武斗最激烈的时期，涪陵“忠实派”始终在强大的驻涪陵地区支左部队的支持下，所以“忠实派”里没有发生公开的杀俘虏等违法现象，这也使得在之后几年的大清理中“忠实派”的头头中为此而被清理的远远少于“资派”；这样的“一派掌权”格局也直接导致了在当时的四川很少见到而在涪陵才有的所谓“安定团结”的局面。

1968年5月16日，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时只有22岁的我被结合进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担任常委，并被安排为地革委政治部所属的学校组组长，具体负责管理涪陵全区的学校教育工作。

地革委学校组设在原中共涪陵地委大院内，办事员开始只有三四人，其中有原专署文教科的几个干部，后来还抽调了红代会一名红卫兵到学校组工作（和现在只管涪陵一个县的涪陵区教委有在职人员近200相比，当时还要管十个县的学校组是够精简的了）。

在我担任学校组组长期间主要直接负责办了三件事：

一是先后负责对涪陵地区中等专业学校1967级、1968级毕业生的分配，以及分配来涪陵地区的1967级、1968级大专院校毕业生（当年涪陵地区还没有一所大学）的安置。

二是于1968年8月10日至25日在武隆县主持召开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区教育工作会议。

三是于1969年4月14日至28日在石柱县主持召开了全区教育工作座谈会。

特别是第一件事，很具体，很容易引起矛盾，因为直接涉及被分配学生的工作地方和工作单位好坏的大事（特别是被分配的中专学生，因为当年的中专学生是按国家计划分配安排正式工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涉及他们前途的大事。我自认为比较好地处理了各种纠纷，也比较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我在查阅资料时，不经意间所发现的一个与那两年涪陵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大局有关的情况。

根据我手头的纸质文本资料（2004年出版、由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11-1978.11）》）显示，在涪陵地区“一派掌权”后的第二年，即1969年，作为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的《四川日报》竟先后10次发表文章介绍涪陵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先

进经验，而且《人民日报》也多次加以转载。而同样是据该纸质文本资料记载，以后五年的总和也达不到这个数量。

这些文章有（以下为《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11-1978.11）》原文）：

1月12日 《四川日报》报道涪陵乌江航运社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自力更生建造一批船舶，使乌江客货运量飞速增长，1968年超过前两年的水平。该社还将航线延长61公里，深入到贵州施南等县，运去化肥、盐巴、汽油等物质，受到贵州人民的欢迎。

1月29日 《四川日报》报道，涪陵地区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革命干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了大春备耕热潮，至1月中旬，全区已上马的1600多处水利建设工程，已有700多处完工，农田基本建设、积肥造肥和小春田间管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3月18日 《四川日报》报道涪陵地革委的领导深入到酉阳、秀山、黔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即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在他们的带动下，武隆、彭水、石柱等县革委会的领导人也纷纷走出办公室，深入第一线领导春耕生产。25日，《人民日报》就此作了报道。

5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四川省革委会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涪陵县革委会和解放军支左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全县应解放的干部绝大多数已经解放出来。

5月29日 《四川日报》报道，涪陵地区小春获得丰收。据统计，全区本年度小春粮食增产15%左右。豌豆、胡豆增产幅度更大，历史上小春产量较低的彭水、黔江、石柱等县，本年度小春产量都超过了往年。武隆、涪陵、丰都、秀山等县一些公社已超额完成小春征购任务。

6月13日 《四川日报》发表涪陵地革委生产指挥组农村调查组的文章《心中升起红太阳，天大困难脚下踩》。文报道武隆县后坪公社贫下中农以大寨人为榜样，开展群众性的抗灾自救斗争的先进事迹。

6月17日 《四川日报》发表涪陵地革委生产指挥组的文章，报道黔江广大社员踊跃交售夏粮。在短短的10多天里，全县超额完成了小春粮食征购任务。

7月22日 《四川日报》报道，黔江县革委会一面狠抓粮食生产，一面充分发动群众储粮建仓。全县集体和社员个人储备粮共有240万公斤。92%以上的生产队有集体储备粮，80%以上的家庭有余粮。

9月23日 涪陵地革委生产指挥组、武隆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在《四川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人换思想地换装——记后坪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事迹》

11月4日 《四川日报》发表四川省革委生产指挥组交通组写的通讯，《秀山养路段公路越养越好》。

在媒体形式单一（当年无电视、无互联网，传统的平面媒体是最主要的形式），而且地处四川边陲、一向不被四川当局所重视的涪陵，1969年竟然得到《四川日报》的如此青睐，那么，对于这一我不经意间发现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由于当年蜀地大乱未治，而唯独在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黄鹤寿、李畔两位首长治理之下“一派掌权”的涪陵地区却似乎相当安定。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事实是，当时四川日报社还专门在涪陵设立了记者站，该记者站的负责人是陈文翼先生（老家垫江），我和他的私人关系也比较好。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在整个四川，只有涪陵的造反派是真正掌握有实权的，在这一点上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的黄鹤寿、李畔两位首长功不可没，所以你们自己一定要珍惜。

（2013. 1. 10. 完稿）

附录：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

对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

一、以涪陵军分区第二政委李畔同志为首，负责领导涪陵军分区部队的支左工作。

二、在军队内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定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彻底肃清其影响。

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坚决支持革命派，虚心地、诚恳地接受革命派的意见和批评，同他们心连心，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对涪陵专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如：“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造反兵团”等）、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平反工作，要认真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没有平反、释放的，要立即平反，立即释放，并做好善后工作，同时要认真地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组织。

四、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涪陵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联合通告》的精神，切实做好对保守组织的工作，使其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五、大力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有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切实贯彻执行六月六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通令和军区执行这个通令的意见，并根据军区指示，作好贫下中农进城的工作，发现武斗前，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如发现武斗，要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成都军区

【文摘】

## 四川文革中的“知情人员学习班”

曾庆祥

按：本文原载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四川史编辑部、当代四川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史资料》2010年第1期（总第37期），作者原为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1967年被中央批准作为四川省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秘书。

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诬陷、打倒原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一大批老同志，1968年秋，省革委把这些老同志原来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举办了一个“秘书学习班（后改称知情人员学习班）”。我作为廖志高（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被通知参加，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尽管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却给我留下了一段挥之不去和一言难尽的回忆。

### 学习班成立的背景及经过

1967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后简称“红十条”），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撤销了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实际上是以省革筹小组取代了中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两级党组织和政府。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所有书记都被当作“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冲击和批判斗争，有的还被“群众专政”失去人身自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全省地、县各级党政许多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揪斗和打倒。

1968年5月初，省革筹小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宣称：“终于摧毁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把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一个一个揪了出来，取得了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经中央批准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于当年5月31日正式宣告成立。西南局、省委原来一直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中，李大章、天宝两人经中央指名任省革委副主任，成为革命领导干部，其余均属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后称‘李（井泉）、廖（志高）死党’）”，有的被押送北京，有的被送到成都昭觉寺监狱关押，省革委相应成立了若干专案组，对他们逐个立案进行审查。

省革委举办的“秘书学习班”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立的，主要是为多个专案组提供材料，以便他们伪造“罪证”，彻底打倒这些老同志。

最初举办的“秘书学习班”，参加的人数不多，除我以外还有：

李井泉的历任秘书陈振寰、冯希尧、黎本初、王夫合；

许梦侠的秘书丁家骥；

杜心源的秘书陈钟光、卢子贵；  
赵苍璧的秘书陈玉昆、卜太江；  
杨超的秘书向嘉贵、包叙定；  
杨万选的秘书杨中虎；  
苗逢澍的秘书李月春；  
程子华（西南局书记）的秘书胡克新；  
闫秀峰（西南局书记）的秘书岳忠；  
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的秘书饶趣；

还有受“彭德怀反党集团”牵连被贬到四川任副省长的邓华将军的秘书谢公贵等，共有十多人。

“秘书学习班”搞了一个多月后，又改名为“知情人员学习班”，陆续增加了：

原省委的三位副秘书长周颐、贾丕绩、贾光后；  
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李定邦、裘尧铿、蔡明德、刘传荣；  
曾在省委办公厅后又调西南局工作的林凌；  
李井泉、廖志高的警卫员吴桂清、刘寿祥；  
省公安厅警卫处干部高占庭；

李井泉夫人肖里（当时也被关押在昭觉寺监狱）在轻工厅的秘书舒志兰和该厅工作人员李解、王××等。

加上原来的秘书，整个学习班，总共也只有三十多人。

学习班的地点，先后在成都市的罗家碾、实业街、东城根街口的几处招待所，到1969年秋结束，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学习班的主持人是文革初期成都有名的军队造反组织“空字028红总”一位姓沈的干部，工作人员和各小组正副组长都是从“空字028”、西南局和省级机关造反组织抽调来的造反派骨干。

### 施加政治压力，开展“揭发”工作

1968年8月，“秘书学习班”刚开始的第一天，省革委副主任刘结挺（文革前任宜宾地委书记）专门来同大家见面和谈话，他同我们这些秘书过去交往很多，都十分熟悉。这次见面，尽管当时在座只有十几个人，但他装着都不认识，摆起架子，身后还站着一位背枪的解放军战士，如临大敌。他讲话时也俨然以首长作报告的姿态，居高临下，极力强调：“当前在四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李、廖死党’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十分尖锐，你们站在哪一边是政治方向和立场，甚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学习班领导向我汇报，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思想顾虑，主要是怕自己被划到‘李、廖死党’反革命路线上去。”然后威胁说：“依我看，你们本来就是这条反革命路线上的人嘛！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认真揭发‘李、廖死党’及其一小撮同伙的反革命罪行，彻底同他们划清界限，争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揭发工作，也是对你们的挽救。”刘结挺这个讲话充分表明了省革委举办这个学习班的目的和任务，



同时也给我们施加政治压力，从政治路线上给我们定了性，使大家非常反感。

后来，学习班组织大家座谈讨论这个讲话时，都从暴露自己思想的角度，程度不同地表达了抵触不满情绪。我在发言中说：“我给廖志高当秘书是组织上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要求去的，我同他纯属工作关系，同路线问题完全是两码事，说我本来就是他那条反革命路线上的人，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现在也想不通。

‘李、廖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当然要彻底揭发，我也一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绝不隐瞒，我在廖志高身边工作十多年，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我的工作笔记和办公厅以及有关单位的会议记录可查，但现在单靠我个人凭回忆思考确有一定困难，希望学习班把省委办公厅造反组织抄我家时拿走的几十本工作笔记退还给我，以便查有实处，能把问题找准，真正作到实事求是。”

我的发言当场受到学习班负责人的严厉斥责：“你是借暴露思想为名，歪曲和对抗学习班即将开展的揭发工作，特别是你讲的揭发问题要实事求是，实际上起了动摇军心，拉其他秘书后腿的坏作用。”

后来参加“知情人员学习班”的人员，听了刘结挺讲话的传达后也非常反感，发牢骚、讲二话发泄不满情绪。轻工厅保卫干事李解说：“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派’，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没有想到这个讲话把我这个小小干事也划到走资派的反革命路线上去了。”公安厅警卫处的高占庭说：“李井泉下乡我才临时被派去作保卫工作，一年没有几次，时间也很短，实际干的又是开车门、端茶杯、打雨伞、提尿壶的工作，找错了对象。”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蔡明德说：“我的主要工作是‘李、廖死党’开会时，负责发通知、布置会场、装喇叭、排座次……既不参加会议，也没作过记录，要我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是赶鸭子上架，强人所难。”因此，他们也被说成是抗拒揭发、散布消极抵触情绪，在其他知情人员中造成不良影响，受到严厉批评。

学习班开展揭发工作的具体作法是：首先要求每个人认真加快思考，也允许互相酝酿交流，然后召开小组、联组或全班大会进行口头揭发，最后以个人名义写出书面揭发材料，直接交给学习班。口头揭发过程中，每个秘书和知情人员必须以各人原来工作或服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对象，“对号入座”，及时提供揭发材料。比如，我的主要任务是揭发廖志高，凡是在小组、联组或全班大会上，只要有人在揭发中提到有廖志高参加的会议和他的某些言论或活动，我就必须当场“拿话来说”，如果讲不出来或者讲不到点子上，主持会议的学习班领导就会当场批评我隐瞒、包庇廖志高的罪行，并且发动大家对我进行“帮助”，实际上是开展变相批斗。其他秘书和知情人员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遭到批斗。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每个人同原来工作或服务的对象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最典型的是邓华的秘书谢公贵，由于邓华是犯有“错误”被贬职下放到四川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机械工作，很少参加西南局、省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同李井泉、廖志高等平时接触也不多，谢公贵给他当秘书的时间又不长，因此揭不出什么问题，只能讲一些邓华家庭情况或生活琐事，因而被作为抗拒揭发，“已被邓

华彻底收买”“中毒太深”的典型，经多次进行“帮助”和大会批斗，始终过不了关。一个多月后，1968年10月中旬，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当时关押在昭觉寺监狱的邓华突然被通知去京参加这次会议（据史料记载是毛主席点名要他参加的），回来后立即解除关押，予以解放。进学习班不到两个月，一直被作为批斗重点的秘书谢公贵，也立即被学习班宣布为“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放回机关不再参加学习了。

学习班这种“对号入座”和多次开展“反揭发”批判斗争的作法，使我们增加了极大的思想压力，被迫写出的揭发材料也花样百出，很难达到多个专案组的要求。不久，因为我写的揭发材料很不像样，就被作为“坚持‘李、廖死党’反革命立场”和“反揭发”的典型，成为继谢公贵之后的重点对象，多次遭到批斗。为此，学习班领导找我个别谈话并提出警告：“你和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许梦侠的秘书丁家骥三个人当秘书的时间最长，但你们的揭发材料都很不像样；特别是你还经常讲一些反揭发的言论，比如你一再强调揭发要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也有阶级性，你揭发的问题可能都是事实，如果立场不转变，阶级觉悟不提高，你就抓不到这些事实的要害，也写不出像样的材料，甚至会出现错误。”

为了促使我提高觉悟、转变立场，事后他又要一位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一份阶级觉悟高、能抓住要害的揭发材料，要我认真学习和思考。这份材料（揭发人的姓名用纸条蒙上了）是揭发李井泉有一次打麻将，摸到一张没有用处的东风牌，就气愤地甩了出去，还谩骂：“去他妈的东风！”揭发材料就此上纲上线说：这件事情虽小，但充分暴露了李井泉“反党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本质”。我看了这份材料，尽管觉得生搬硬套令人哭笑不得，但确使我受到一些“启发”。不久，我经过回忆和思考，在全学习班大会上揭发了贺龙和廖志高的“罪行”，事情的实际情况是：1966年春，廖志高陪同来川视察的贺龙去三线建设地区的渡口（现为攀枝花）市，途经西昌地区时，看见沿途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孬，还有一些荒芜的土地，贺龙因此发脾气，训斥了廖志高和地委书记李占林，并且责令省委尽快从内地调人来西昌抓好农业生产，廖志高立即告省委研究后决定调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武胜县委书记苏林到西昌提任地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我就这一事实上纲上线说：“贺龙到处发脾气，随便训人骂人，充分表现了他‘土匪恶霸’的本质。”同时说“廖志高完全秉承贺龙的黑指示办事，充分说明他是贺龙的‘同伙’”。当时我自认为能抓住问题（比李井泉打麻将这类小事更有价值）的要害，说明我的阶级立场已有所转变。没有想到这个揭发却被主持会议的学习班领导当成毒草，遭到批判：“第一，贺龙是全国闻名的大反革命，他能关心生产吗？你这是小骂大帮忙，给他搽胭脂抹粉；第二，廖志高同贺龙是一丘之貉，你揭发他被贺龙训斥，实际是为廖志高开脱。”最后的结论是我“顽固地站在李廖死党的反革命立场，为贺龙、廖志高翻案”，从而使我不知所措，心灰意冷，再也不敢写成上交学习班的书面揭发材料了。

不久，学习班在揭发“‘李、廖死党’及其一小撮”个人罪行的同时，开展了贺龙搞“二月兵变”的专题揭发，还印发了省革委从北京搞来的关于贺龙企图

搞“二月兵变”的罪行材料，要大家联系四川的实际进行揭发。为了进一步给大家施加压力，学习班领导极力强调：“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是贺龙搞兵变的后方基地，‘李、廖死党’必然在这方面犯有许多罪行，你们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思考、揭发，拿出像样的材料来。”

在学习班的压力下，大家被迫东拼西凑、生搬硬套，揭发出了许多牵强附会、荒诞离奇的“罪证”材料。比如：把贺龙在晋绥老区和湘西的老部下李井泉、已故多年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和后来继任的黄新廷，都说成是贺龙为“二月兵变”后方基地组建的领导班子核心成员，位于××县山区为备战修筑的大型防空洞（当时属绝密军事工程）成了贺龙兵变后方基地的地下司令部，贺龙几次来川在成都等地区参观视察132厂等国防兵工厂，以及1966年春去西昌时曾讲过当地有名的“建昌马”虽然体形不大，但行走平稳，宜于跑山路，要大力发展等，都说成是贺龙处心积虑为兵变准备武器和军事装备。

由于我前一段揭发贺龙在西昌因农业生产搞得不好发脾气的事遭到批判，还心有余悸，因此在揭发“二月兵变”的大小会上我很少发言，学习班领导又专门找我个别谈话，要我把贺龙发脾气的事同兵变联系起来考虑，还启发诱导说：“搞兵变打起仗来需不需要储备粮食！”我只好又把这件事拿出来改头换面，说成是贺龙企图为兵变准备粮草，还画蛇添足，把廖志高陪同贺龙去渡口市途中停车休息小便的事，说成是实际上是为兵变“视察地形”。

其他没有同贺龙接触过的“知情人员”，也因揭不出什么问题或说不到点子上受到批评，思想压力很大，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予以应付。如林凌只好把大家在下面酝酿或会上口头揭发的一些事实，运用他善于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搞“技术加工”，从国际、国内形势和当时的背景进行分析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得以蒙混过关、免遭批斗。

对于这些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罪证”材料，究竟有多少价值，许多同志都心中有数，会后大家还在下面互相评论甚至开玩笑。我曾嘲笑林凌揭发的材料是危言耸听，貌似“钢鞭（指像样和有份量的材料）”，实际上全是水分，一文不值；刘文珍的秘书饶趣也嘲笑我揭发廖志高陪同贺龙去渡口市途中停车休息小便说成是为兵变观察地形的材料，是“耍魔术，廖志高屙尿也成了二月兵变。”

参加学习的秘书和知情人员，过去长期接触和交往，互相了解和相处一直很好。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有些同志因揭发的问题不像样或有“反揭发”言行时，大家就必须按照学习班的部署，对其进行“帮助”和批斗。尽管大家在会上对这些批斗对象声色俱厉，无限上纲上线，但彼此都心照不宣，这是在学习班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并未因此产生任何芥蒂和个人恩怨。相反，会后在下面仍然一如既往，互相关怀和爱护。我曾多次被作为重点遭到批斗，但每次会后都有不少同志对我进行安慰，要我正确对待，不要背包袱，以缓解我当时的思想压力；有的同志还冒着风险帮助我摆脱当时的困难处境。

我至今仍然记忆较深的两件事：一是按学习班规定每隔两周才有一天假期，有一次我被批斗后责令继续留下考虑问题，不准回家，许梦侠的秘书丁家骥在自

己短短一天的假期中挤出时间去我家，对我爱人说明情况进行安慰，回学习班后又悄悄告诉我家里的近况，要我不要担心。二是廖志高专案组对我写交的揭发材料很不满意，专门来学习班撇开我召集了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小组少数学员参加的会议，介绍了我以揭发为名实际是为廖志高开脱的许多具体问题，准备第二天对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批斗。杨超的秘书包叙定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当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冒着风险私下给我透露了专案组讲的全部内容，还特别指出他们要追查我“转移私藏”廖志高办公室挂的军用地图的去向问题（实际情况是1966年11月，社会混乱，造反学生进驻省委机关时，我已连同军区送给廖志高的一些重要文件，退给成都军区有关部门了），从而使我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第二天的批斗大会上，我对他们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追问，都能说明实际情况，一一作了回答，使他们只能对我上纲上线进行批判，无法再纠缠下去。

学员之间这种相互关怀爱护的事例还不少，按学习班的部署，每天早晚要集合大家歌唱革命歌曲，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毛笔字写得好）有一次为学习班抄写歌单时，粗心大意，把歌词中“亲人解放军”抄成“敌人解放军”，幸被苗逢澍的秘书李月春及时发现作了纠正，他也一直未将此事向学习班的任何人透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1969年秋，学习班突然召开了两次大型批斗会。一次是针对一位秘书×××，因为他来学习班前已参加机关造反组织，没有把学习班工作人员和其余学员放在眼里，经常不遵守班规、迟到早退；有时还在自己揭发问题时乱点其他人的名，积怨甚多；因此被作为“违反班规纪律，给揭发工作制造混乱”的典型，在全学习班大会上进行批斗。另一次是针对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来学习班前是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已经是被打倒的郫县“头号走资派”；来学习班后，由于思想压力大，加上粗枝大叶的习惯，来后不久写交的一份揭发材料中，引用“红十条”中“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时错写成“以毛主席为首的一小撮”，黑字写在白纸上，证据确凿，被学习班作为“现行反革命”进行大会批斗，郫县也被通知派了人参加，最后在一片打倒声中被代上“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两项帽子，押回郫县进一步批斗。

这两次批斗会的内容，都是学习班早已掌握了，推迟到最后才召开，主要是对我们的利用价值已经告罄，再也挤压不出什么东西了。因此，这两次批斗会的第二天，学习班就宣布结束，我们中绝大多数人也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

### 枉费心机 事与愿违

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中，省革委成立专案组和举办“知情人员学习班”，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妄图搜集和伪造“罪证”来打倒西南局和四川省当时被立案审查的老同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枉费心机，事与愿违，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这些老同志都相继被解除监护，恢复名誉，重新担任了多项领导职务，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贺龙同志，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彻底平了反。事实充分说明：西南地区

和四川省，根本不存在“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同伙”和“李廖死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如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知情人员学习班”对我们施加的政治思想压力，以“帮助”为名的种种变相批斗，以及长达一年的困难处境，至今令人难以忘情。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使我们更加珍视当前的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的气氛，心情也更加愉快。尽管我今年已八旬有余，但仍然抽出时间和精力，把它整理出来，供研究四川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部门和同志参考。

---

### 【故纸堆】

## 向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传达中央指示

张国华等

按：原件无标题，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

遵照中央指示，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四川日报》和全省各地、市（州）、县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报纸及广播电台，目前只转载新华社、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和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一律暂停刊登、播送地方新闻消息节目。

各地支左机关，要派出军宣队帮助报纸、电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认真做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全省所有的群众组织所办的小报、刊物和有线广播（站），一律撤销。

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

刘结挺、张西挺、谢家祥

徐 驰、何云峰、郑志士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四川泸州红联站派省专分站翻印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

### 【小资料】

## 四川省甘孜州文革资料部分篇目

李晓航 搜集整理

按：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西部，州府设康定县，辖炉霍、泸定、

得荣等 18 个县，川藏公路经过境内。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也毫无例外地被卷入文革狂潮中，曾因一首优美的《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而闻名于世的高原小城也被批斗、打砸、抓捕的暴戾之气所笼罩。从这部分资料篇目及其提要中即可略见这一史无前例大动乱之一斑。

李晓航先生对史料的这种严谨、细致的整理方式也很值得学习、借鉴。如果不同地区的文革资料收藏者和研究者都能像这样把散见于民间的史料搜集起来并加以归类整理，对文革研究定会大有裨益。

## 传单类——

1966. 12. 09 **《战斗宣言》**（州人民医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6 开，3 页。打字油印）：我们庄严宣告：“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正式成立！

1967. 01. 02 **《最强烈的抗议！最坚决的声援！》**（无产阶级钢铁战斗队。16 开，3 页。手刻油印）：我们坚决要求州委、州文革出面表态。如果发生了武斗，发生流血事件，你们必须负完全责任。

1967. 01. 05 **《宣言》**（毛泽东路线战斗兵团。16 开，4 页）。我们的行动口号是打倒州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决心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头！

1967. 01. 05 **《最强烈的抗议，最坚决的支持》**（6711 战斗队。16 开，2 页）：我们认为炮轰团元月 1 号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不怕围攻，不怕受侮辱，不怕挨冷受饿，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气概。我们向你们致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1967. 01. 14 **《告全州人民书》**（成都革命造反派赴康炮轰团等 51 个群众组织。8 开，1 页。铅印）：《甘孜报》于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四日下午四时，由我们查封了！在《甘孜报》查封后，我们出版《红色新闻》。

1967. 01. 14 **《查封〈甘孜报〉第一号通令》**（康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所属九十个革命组织。16 开，1 页。铅印）：我们查封的理由是：《甘孜报》忠实地充当了州委这个修正主义司令部的喉舌，他们对革命学生和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不支持，不报道，对革命造反派极尽污蔑之能事。

1967. 01. 15 **《查封〈甘孜报〉第二号通令》**（康定地区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所属九十个革命组织。16 开，2 页。铅印）：《甘孜报》停刊后，州委必须负责解决《甘孜报》原订户订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的问题，保证以上四种报刊的发行，满足革命群众的需要。

1967. 01. 29 **《“向革命的解放军学习”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口号》**（外地赴康革命造反兵团宣传组。16 开，2 页。铅印）：试问：毛主席说的“向解放军学习”难道是向不革命的解放军学习吗？这分明是在污蔑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7. 01. 31 **《揭穿黑幕——成都金属杂件社是怎样被强行搬迁去康定的？》**（成都金属杂件社全体革命同志。16 开，5 页。手刻油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英明指示，借“支援山区建设”为名，

行转移斗争方向、抵制文化大革命之实，使我社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遭到扑灭。

1967.01.31 **《我们的控诉》**（成都金属杂件社杨科玲等。16开，4页。手刻油印）：杨科玲：我向工作组提出：现在我已怀孕八个多月，就等生小孩子以后再走吧！因为要乘两天的汽车，震动很大，怕出危险。工作组回答：你去嘛，不会出问题。如果你一定不去，我们把户口拿到康定去，小孩的户口也要上在康定。万伯谦：我年老多病，是高血压，又是关节炎，本来就不适合高原的气候。但工作组说：你们要不去康定，就与你们当地派出所联系，不予工作。

1967.02.14 **《严正质问康定军分区》**（解放大西南联合赴康调查团。16开，1页。手刻油印）：我团负责人今晚7点多钟应邀到军分区，但军分区某负责人竟声言：“你们那一伙在那胡闹，你们不把这些弄走，就不给你们谈。”我们要质问军分区，你们为什么出尔反尔？

1967.02.20 **《假开学，真反扑——揭露“红教工”中一小撮混蛋的新阴谋》**（州人委红色政权革命造反兵团“缚苍龙”造反团。16开，3页。手刻油印）：“红教工”已经不是革命组织，他们根本没有权利发出任何通令。其目的就是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小学的领导权。如果你们硬要一意孤行，以卵击石，革命的历史车轮将把你们碾得粉碎。

1967.04.20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康定地区目前形势的紧急呼吁》**（康定“东方红”红色造反队。8开，1页。手刻油印）：激战的前夜，康定山城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1967.04.24 **《宣言》**（“东方红”红卫兵。8开，1页。手刻油印）：我们“东方红”红卫兵光荣地诞生了！我们“东方红”红卫兵杀出来了！我们的钢铁般的战斗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1967.04.28 **《造反宣言》**（康中红卫兵。8开，1页。手刻油印）：我们康中红卫兵造反总部宣告成立了。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冲，让阶级斗争的大风浪更猛烈些吧！

1967.04.28 **《1230及其所属的一些保守组织必须马上大乱！》**（16开，1页。手刻油印）：有革命造反劲的同志们站出来吧！我们要造总部中那一小撮人的反，我们要把他们揪出组织外去！

1967.05.01 **《庆祝“五一”》**（康中红卫兵〇一一支队。8开，1页。手刻油印）：这一节日的到来标志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而发展到了更高、更新的阶段。

1967.05.10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康师农奴戟造反团。16开，2页。手刻油印）：我们千言万语，千仇万恨，并成一个字：“杀！”

1967.05.14 **《掩耳盗铃的把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满江红”战团。16开，1页。手刻油印）：康中红卫兵、1230是真正的假造反，赶时髦，企图浑水摸鱼。

1967.05.15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红代会清华井冈山6268部队赴康观察员。16开，2页。手刻油印）：以王润富、康辑熙、李英荏一小撮坏蛋阴谋策划和操纵的官办的“保”字号组织——红联总、红公安、公检法1940、1230等，

极力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居民斗学生，破坏工农联盟，挑起民族纠纷。

1967.05.16 **《严重警告，强烈抗议！》**（外地赴康学生宣传组，16开，2页。手刻油印）：康中红卫兵“天翻地覆”等一小撮混蛋，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昨日晚上抢了“红艺兵”的队部，公然叫嚣：“我们就是联动精神。”还造谣说：“中央给联动平反了。”简直是反动已极，混蛋透顶！

1967.05.16 **《州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二、三月份“镇反”前后充当的什么角色》**（州委机关游仲熙等6人。16开，4页。手刻油印）：“黑联总”和“黑公安”在二月份把革命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成都工人造反兵团1211支队”、“红艺兵”、“红教工”、“6711路锋（？）战斗队”打成了反动组织，并在二、三月份先后两次拘捕所谓犯罪分子，大量拘捕革命群众。打击了造反派的革命精神，把康定地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扼杀下去了。

1967.05.17 **《从两副对联谈起——一致一两位正人君子》**（“五·七”红色造反团“有来有往”战斗队。16开，2页。手刻油印）：康中小食堂的大门上贴了两副对联：屁股灯圆何处有油何处舔，脑亮溜尖那派得势往那钻，是者心虚。顽固不化死心塌地保刘邓，乔装打扮原形毕露白骨精，正人君子。两副对联针锋相对。前副是说“造反有罪，是投机。”后副是说：“保皇有罪，罪该万死。”

1967.05.17 **《态度“坚决”，行动“神通”——“黑联总”、“州委黑总部”如此“拥护”“贯彻”中央十条决定》**（州委机关“迎风暴”。16开，2页。手刻油印）：从“联总”的紧急大会到下面的努力学习，坚决贯彻，充分说明广大群众是真心实意拥护中央决定的，是认真坚决贯彻的，也是有独立思考的。另方面也完全暴露了少数人在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把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变成了少数人运动广大群众，对抗中央决定，对抗中央，对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抗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用心何其毒矣！

1967.05.17 **《最最紧急呼吁!!!》**（雅江县红太阳造反队等。8开，1页。手刻油印）：在“二月黑风”中，武装部个别领导支持保守派，转移斗争大方向，十一个组织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或“右派组织”。在不到200人的县城机关干部中竟有48人被捆、打、跪、挂黑牌、照相、游街、请罪，被勒令自首11人，6人被拘捕。二月中旬，全县无产阶级革命烈火就扑灭了。

1967.05.18 **《就目前康定地区形势的10个为什么？？》**（“11·5”红挺造反团“为什么”战斗队。16开，2页。手刻油印）：中央关于四川问题决定下来后，为什么有人公然明目张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什么“中央决定没有通过毛主席”、“决定不全面，只听取了一方的意见”？为什么“二一七”信件一眨眼满天都是，中共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直到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农村还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急忙到农村宣传说什么“炮轰派要造贫下中农的反”？

1967.05.18 **《杀出“工赤”彻底闹革命》**（“破冰船”红色造反团。16开，4页。手刻油印）：“工赤”一开始就大量翻印工贼的讲话，流毒甚广，余毒未消，这是我们杀出“工赤”的原因之一。“工赤”有严重的奴隶主义，二月份奉命砸了康师附小“星火燎原”战斗队，充当了二月“镇反”的帮凶、刽子手。



1967.05.18 **《严重警告》**（甘孜州财贸“东方红”战团。16开，1页。手刻油印）：“财贸兵团”及其所属保守组织从一月底非法盗取和至今把持、操纵着财贸系统各部门的一切大权。煽动群众停止工作，瘫痪机关，破坏生产。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你们的罪恶活动。

1967.05.18 **《“红联总”到底是什么货色》**（“破冰船”红色造反团。16开，3页。手刻油印）：“红联总”自成立以来，一直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二月镇反”中充当了急先锋，他们打、砸、抢、抄了炮轰派几十个群众组织，并捆绑毒打了不少群众，整了不少的黑材料，这笔账必须彻底清算！

1967.05.19 **《“黑联总”和州委“黑总部”在挑起武斗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州委机关“五·一七”革命造反战斗队。16开，2页。手刻油印）：康定地区从二月十九日开始所谓第一次“镇反”之后，出现了捆、绑、打、跪、挂黑牌、站高凳等严重的武斗情况。

1967.05.19 **《“红联总”是官办的保守组织——揭露“红联总”黑幕之一》**（州委机关“迎风暴”造反团。16开，7页。手刻油印）：1、“红联总”的发展过程；2、“红联总”是官办的保守组织；3、“红联总”的大方向错定了。

1967.05.20 **《给康定军分区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红卫兵康师农奴戟造反团。16开，4页。手刻油印）：1、刮“二月黑风”，对革命造反派进行血腥镇压，制造白色恐怖。2、在支左问题上，实行的是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刘邓路线，压制和扼杀了“四大”民主，压制革命的小将的“五敢”精神，把康区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企图使文化大革命夭折。3、军训本来是为了促进我们革命师生的思想革命化，可是这次训练不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忠实地执行拿枪的刘邓路线，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1967.05.23 **《“剖析”破冰船》**（“五·七”红色造反团。16开，1页。手刻油印）：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说出了造反派的心里话。同时它宣布了以“红联总”、“1230”为首的保守组织的死刑。但是，也有一些保守组织乔装打扮之后，又粉墨登场了，“破冰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1967.05.28 **《“纯”与“不纯”》**（康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戟战团，16开，6页。手刻油印）：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对抗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用反动的血统论、唯成份论代替党的阶级路线，在“纯”与“不纯”中大做文章，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为了帮助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我们特转抄了王效禹同志的文章。

1967.05.28 **《何子健何许人也？》**（“伏虎”战斗队。16开，1页。手刻油印）：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我们要正告瘟神何子健，立即滚出康定去，赖在这里不走是不行的，拖延得愈久，你对康区人民欠下的债就愈多。

1967.05.29 **《严正警告！紧急呼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韶山”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向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发出紧急呼吁，擦亮眼睛，戳穿“红1230”一小撮混蛋头目的阴谋诡计，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1967.05.31 **《敢怒不敢言·打气·老子不整死他才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韶山战斗团“揭阴谋”等战斗队。16开，3页。手刻油印)：从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阶级敌人心不死，在他们灭亡之前总是要阴谋，放暗箭，蒙蔽广大贫下中农，镇压他们的死敌——革命造反派。

1967.05.31《略评“五·一二”代表在“根本否定‘二月镇反’誓师大会”上的发言》(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5页。手刻油印)：五月二十八日，康定炮轰派临时联络总站在广场召开了“根本否定‘二月镇反’誓师大会”。但是，公安处“五·一二”的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完全唱反调，最后被轰下了台。

1967.05.31《“黑公安”三次抓川大八二六王恩同志的丑剧》(州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黑公安”企图将外地赴康的革命学生全部置于死地而后快。

1967.05.31《赵纯早就是一个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州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赵纯布置的任务是：1、调查掌握外地串连学生的人数、情况及活动；2、机关中起来造反的人数及情况；3、康定地区成立的革命造反组织的情况；等等。

1967.05.00《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商业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韶山”战团。16开，3页。手刻油印)：“二月黑风”吹燃了投机取巧的商业兵团，使其死灰复燃。“红工一二三”公开违抗毛主席的指示，用成份来压制革命群众，打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其一些成份不好的同志不敢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

1967.05.00《评“一二三〇”的“造反宣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韶山”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

1967.05.00《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韶山”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康区的产业军”的黑后台使出了绝招，利用贫下中农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大造谣言，挑起贫下中农对造反派的不满，制造摩擦。

1967.06.01《彻底清算“黑公安”的罪行，揪出“黑公安”的后台示众》(续五)(州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二月十九日，公安处召开全体干部会，宣布了分工拘留、逮捕炮轰派同志的名册，带上手铐、绳子分头出动，对康定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开始残酷的镇压。

1967.06.01《揭发“黑公安”在泸定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州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今年一月下旬以来，“黑公安”的魔爪就伸到了泸定，来往于康泸之间。

1967.06.03《彻底清算“黑公安”的罪行，揪出“黑公安”的后台示众》(续六)(州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二·一九”对康定地区炮轰派革命战士进行第一次大搜捕后，一小撮杀人眨眼的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就此罢休，在“黑公安”的黑角落里，一场更大的阴谋在酝酿着。

1967.06.03《王润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一)(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由不准建立群众组织到策划建立官办组织。

1967.06.05《严重警告——致背后支持、操纵保守号组织的康定县公检法中

**的一小撮混蛋!》**(州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县公检法中一小撮混蛋在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决定下达后,仍不死心,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向革命造反派——炮轰派疯狂反扑,其目的何其毒也!

1967.06.05 **《卫东战团关于坚决支持红造司革命小将严正声明》**(炮轰派万山红遍造反兵团卫东战团。16开,1页。手刻油印):红造司是我州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和最勇敢的闯将。二月黑风、三月逆流中,英雄的革命闯将惨遭迫害。红造司井冈山战团收回被反攻倒算去的总部住地“沙公馆”是正义的革命行动。最最严重警告一小撮当权派,你们休想从六·四事件中捞到半根稻草。

1967.06.06 **《安玉梅在“二月镇反”中依靠什么人“揭发”革命造反派材料的?》**(州公安“红卫”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目前安玉梅仍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在幕后操纵“1230”这个保守组织,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扼杀革命造反派。

1967.06.07 **《给保守势力的当头一棒》**(公安处“红卫”战团。8开,2页。手刻油印):我们热忱地期望“1230”中受蒙蔽的群众应该当机立断,真正起来造反,坚决、彻底砸烂所谓新生的“1230”!

1967.06.07 **《公安处“红卫”战团关于当前形势的声明》**(州公安处“红卫”战团。16开,3页。手刻油印):他们暗中操纵“1230”等保守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康定军分区,这是不折不扣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7.06.07 **《再看县公检法中一小撮人在干什么勾当?》**(州公安处“红卫”战团。8开,1页。手刻油印):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再不要上当受骗了,应当尽快觉醒,尽早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

1967.06.09 **《这是为什么?》**(州公安处“五·二二战团。16开,1页。手刻油印):“红成”在我州发展约一个纵队,收的人几乎尽是原“土联动”的头头和干将,这又是为什么?

1967.06.11 **《首都红代会赴康炮轰派被劫战士已全部胜利到成都》**(红造司11·5红挺、丛中笑。16开,3页。手刻油印):首都红代会赴康炮轰派21人及川大八·二六两名战士和一名丹巴造反派战士,康定军分区何参谋一行26人,6月8日在双流金华公社被产匪劫走,全体造反派战士经过一天一夜的殊死斗争,在成都军区的帮助下,已于6月10日下午胜利到达成都。

1967.06.11 **《“黑联总”罪恶集》(一)**(炮轰派65战团。16开,14页。手刻油印):1、“红联总”的黑后台究竟是谁?2、从沙纳之死看“红联总”的人道主义;3、揭露“黑联总”的罪行;4、“红联总”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罪恶目的;5、“红联总”就是前州文革和州级机关的变种;6、“红联总”所谓的“丰功伟绩”;7、“红联总”为什么要打天宝;8、黑联总的特务手段种种。

1967.06.12 **《转抄者按》**(原件未署名。16开,3页。手刻油印):康定军分区打击军内造反派,把我成都军区卫校“驱虎豹革命造反团”污蔑为“非法组织”“黑组织”。

1967.06.14 **《甘孜州炮轰派“万山红遍”造反兵团65战团关于目前康定地**

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看法》(炮轰派“万山红遍”造反兵团 65 战团。16 开, 4 页。手刻油印): “黑家五兄弟”的大方向错了。甘孜州炮轰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我们亲密无间的战友。

1967. 06. 14 《**革命造反宣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气象台。16 开, 2 页。打字油印): 甘孜州中一小撮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 至今拒不按中央规定给我们平反。我们决心与康区坚强的革命造反派炮轰派团结在一起, 战斗在一起, 坐牢在一起, 胜利在一起!

1967. 06. 15 《“杨成德事件”的真相》(炮轰派“万山红遍”造反兵团。16 开, 5 页。手刻油印): 15 日凌晨, 由康定军分区党委杜副政委和炮轰派主持, 在 52 医院大礼堂召开大会。52 医院赵院长终于公开做了检查。“杨成德事件”是革命的事件!

1967. 06. 15 《**最最强烈抗议, 最最紧急呼吁**》(红卫兵成都部队赴康联络站。8 开, 1 页。手刻油印): 15 日下午, 红造司中一小撮混蛋对红卫兵成都部队赴康联络站进行了蛮横不讲理的抄、砸、抢、打, 打伤我“红成”战士多人。

1967. 06. 16 《**替马开祥同志翻案是大是大非问题——驳几个谬论**》(州委机关“迎风暴”造反团评论员。16 开, 3 页。手刻油印): 那些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而被冤枉打成“牛鬼蛇神”的革命同志, 我们就是要给他们翻案。

1967. 06. 16 《**泸诚小谈**》(炮轰派 65 兵团评论员。16 开, 2 页。手刻油印): 6 月 4 日, 我从造司夺回沙公馆的革命行动胜利, 给保守派当头一棒。

1967. 06. 17 《“**红成**”**整我兵团黑材料罪责难逃!**》(炮轰派“万山红遍”造反兵团。16 开, 2 页。手刻油印): “红成”这个在蓉城人民心目中有过“崇高声誉”的“左派”于 5 月来驻康, 这是我们康定炮轰派高兴的事。然而现实使我们失望, 他们胆敢整起我兵团的黑材料, 是可忍, 孰不可忍!

1967. 06. 19 《**斗争中的泸城——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州委机关“迎风暴”造反团。8 开, 1 页。手刻油印): 那些热衷于搞“小集团主义”、“山头主义”、“打内战”, 把矛头指向群众等等错误行为, 都是违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教导的。

1967. 06. 19 《**成都红三司十五中井冈山兵团驻康部队紧急声明**》(红色新闻造反团、610 造反战团。16 开, 1 页。铅印): 英雄的红造司为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对不远千里来康扶持保守势力的红成驻康联络站所采取的措施, 是完全必要的。我兵团驻康部队全体指战员绝对地支持他们的果断行动。

1967. 06. 19 《**热烈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炮轰派“星火燎原”造反兵团。16 开, 3 页。打字油印): 当前, 我炮轰派面临的敌人仍然是顽强的, 他们在“红成甘孜州联络站”的扶持下, 又粉墨登场了, 什么“团结炮轰派, 打倒极左派”呀! 真他妈的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如果把我炮轰派与红成州联络站的斗争看成是打内战, 那就抹煞了我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斗争的阶级实质。

1967.06.19《军分区×参谋讲护送红代会战友返京途中亲身所遭遇的情况》（炮轰派炮火连天造反团。16开，4页。手刻油印）：产业军的人对我们搜查，非法抢走我们携带的东西，又打又骂，并说：自从你们红代会的来了，我们就没有好的。可能军分区给他们打了电话，要保护红代会战友的生命安全，他们才给我们送饭。

1967.06.26《就康定形势的几点声明》（红卫兵“虎山行”战团。16开，9页。手刻油印）：1、“炮轰派”是造反派吗？2、保守思潮从何而来；3、我们对红成驻康联络总站的想法；4、支左必须旗帜鲜明。

1967.06.28《名“整风”，实整人，罪证如山！》（炮轰派暴风造反队康定支行15名革命群众。16开，2页。手刻油印）：全行47人（黑金融22人，群众25人），被检查、打击、排斥的共33人，占70%。

1967.06.30《造反声明》（炮轰派“红医”造反队。16开，4页。手刻油印）：炮轰派是康定地区的真正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成赴康联络站”极力扶持保守组织，大整炮轰派黑材料，他们的大方向错定了。

1967.07.05《孔诚同志对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1967年7月5日，在康定为炮轰派平反群众大会上）（康定军分区孔诚。16开，7页。铅印）：我分区部队自今年元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我和分区其他主要负责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认错了门，排错了队，支持、扶植了保守组织，打击、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我州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1967.07.06《德格告急》（首都红代会赴德格战士等。16开，1页。手刻油印）：“七·五”事件是德格地区的第六次武斗事件。我四名造反派战士头部、腰部、腹部严重受伤，至今有两名昏迷不醒。我们向德格县武装部中一小撮混蛋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1967.07.09《老保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一评康定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红色新闻造反团。16开，1页。铅印）：康定保守势力真的已经瓦解了、不存在了吗？没有，远远没有。

1967.07.09《坚决粉碎糖衣炮弹——二评康定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红色新闻造反团。16开，1页。铅印）：他们这样一小撮罪魁祸首，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后，眼看用武力不可能镇压住炮轰派，从而向我炮轰派丢来了糖衣炮弹，对某些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大肆捧场，妄图用资产阶级的吹捧来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从内部瓦解炮轰派。

1967.07.09《红成在干什么？——三评康定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红色新闻造反团。16开，1页。铅印）：红成中的一小撮叛徒头头，提出了“插进甘孜州，稳住脚阵”的口号。为什么红成这样重视甘孜州呢？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多年来密切注视甘孜州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大本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1967.07.09《向地下黑司令部猛烈开火》——四评康定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红色新闻造反团。16开，1页。铅印）：他们采用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

在我炮轰派内部扶持第三种势力，妄图分化瓦解我炮轰派组织；他们在全州各地支持保守势力，不断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他们千方百计打击站出来革命的领导干部，镇压革命造反派。

1967.07.13《**兵马欲动，舆论先行——五评康定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红色新闻造反团。16开，1页。铅印）：向地下黑司令部猛烈开火！这是当前康定舆论的中心。究竟有没有地下黑司令部？造反派说有，保守派说无。地下黑司令部不仅存在，而且正紧张活动着，这是毫无疑义的。

1967.07.15《**革命的同志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炮轰派“万山红遍”七一战团。16开，4页。手刻油印）：革命组织之间有矛盾这是正常现象。大敌当前，如果革命派之间打起“内战”，那就是对人民、对革命的犯罪。

1967.07.15《**蓉城天热大汗淋，康定“避暑”热泪飞**》（某陆军医院革命战士。16开，1页。铅印）：“八·二六”并未气死，“红成”已土崩瓦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高原名城康定是绝对优势。

1967.07.20《**勒令**》（炮轰派“星火燎原”造反兵团“倒海翻江”战团。16开，1页。手刻油印）：我“倒海翻江”战团勒令张崑东、陈昌永：1、立即交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的黑材料。2、彻底交待你们镇压农科所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勾当。限定在7月23日前用大字报贴出来。3、不准再装病躺下，负隅顽抗，进行疯狂反扑。4、必须坚守工作岗位。以上各条必须遵守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1967.07.21《**揭某军医院“黑染缸”的盖子**》（之二）（某陆军医院革命战士。16开，1页。铅印）：我们要看看你们说的“不搞四大单位”是什么货色。你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医院干尽了坏事！“黑染缸”里已孳生了不少黑蚊子，咬了一些人，中了不少毒！再这样下去，某军医院就要改变颜色了！

1967.07.22《**致全州党政机关革命同志一封信**》（甘孜州委机关“迎风暴”造反团。16开，3页。手刻油印）：由于我们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因而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站错了队，参加了保守组织，或多或少的干了对不起甘孜州革命造反派——康师炮轰派同志的错事。我们感到十分惭愧和内疚。

1967.07.28《**从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农科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轰派“星火燎原”造反兵团“倒海翻江”战团。16开，5页。手刻油印）：划框定调，大整群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二月黑风，三月逆流；一声春雷，玉宇澄清。

1967.07.24《**王润富“亮”的什么“相”？**》（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甘孜州1211部队宣传部。16开，2页。手刻油印）：他“亮”的是坚决支持保守组织的“联合总部”的“相”，“亮”的是攻击天宝同志和康定炮轰派的“相”，一句话，他“亮”的是保守组织黑后台的“相”。

1967.07.24《**“驱虎豹”的存在是“非法”还是“合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卫校“驱虎豹”革命造反团。16开，6页。铅印）：我们的组织刚成立不久，康区和某陆军医院即议论纷纷，有时从阴暗角落里传来几声凄厉，几声

抽泣：“驱虎豹”是“非法组织”，是“黑组织”。为了澄清事实，特编写这份材料。

1967.07.25《北京来电》（红色气象革命造反队。16开，1页。手刻油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谢、王首长回京消息后，武汉造反派大为振奋。

1967.07.25《王润富、张寿山与康定地区文化大革命——揭发王、张材料之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甘孜州1211部队。16开，3页。手刻油印）：“青年战斗队”就是“1230”的前身。王润富、张寿山是“1230”的黑后台，“1230”是为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保守组织。

1967.07.25《柳溪是镇压泸定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甘孜州1211部队。16开，2页。手刻油印）：这个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感到在泸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便夹起尾巴逃回了康定。

1967.07.27《揭穿“文斗模范”的伪装》（炮轰派“星火燎原”兵团“倒海翻江”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文斗英雄”住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战士，决不会被笑面虎的笑面混淆视线，也不会被披着羊皮的狼的羊皮蒙住眼睛。

1967.07.28《揭开“老正确”陈昌永的面纱》（炮轰派“星火燎原”造反兵团“倒海翻江”战团。16开，1页。手刻油印）：“老正确”别号“一贯正确”，是老投机、一贯投机的化名。

1967.07.28《发扬一·二八革命造反精神，乘风破浪向前进——八评康定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甘孜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色新闻造反团。16开，1页。铅印）：发扬一·二八革命造反精神，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1967.07.28《痛斥“甘孜州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开”的谬论》（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甘孜州1211部队。16开，2页。手刻油印）：试问，柳溪、王润富的问题揭透了吗？把他们批斗倒了吗？没有。散布“甘孜州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开”的老爷们，现在不要下结论太早了。你们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与柳、王黑司令部全部割断关系，揭发柳、王及其同伙的罪恶，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否则就别怪群众不客气了。

1967.07.28《揪出“一·二九”示众》（炮轰派“星火燎原”兵团“倒海翻江”战团。16开，6页。手刻油印）：唐英、刘柏林亲手播种、培育“一·二九”；没有“一·二九”的“一·二九”；“一·二九”的115天；“一·二九”的阴魂在飘荡。

1967.07.28《严正声明》（红造司“东方红”红卫兵参谋部发言人。8开，1页。手刻油印）：红造司勤务组中一小撮混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发表了一篇《开除公告》，我“东方红”红卫兵被无理开除。尽管如此施加压力，我“东方红”红卫兵坚决不退出红造司，我们要把红造司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1967.07.29《贺信》（炮轰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兵团州医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6开，2页。打字油印）：现在康定地区当权派组织了“1230”的

变种——“贫下中农独立师”。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我们坚信“独立师”中的广大群众将觉醒起来，识破我州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群起反戈。

1967.07.31《口号》（康定军分区支左办公室翻印。16开，1页。打字油印）：立即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7·28”最新指示的高潮；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7.08.01《最紧急呼吁》（炮轰派“五·七”战团。16开，2页。手刻油印）：“万山红遍”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在今日向我炮轰派“五·七”战团射出了第一颗挑起内战的子弹——关于“五·七”退出“万山红遍”的“内部通告”。并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妄图以我战团退出“万山红遍”一事中捞取半根救命稻草，挑起内战。真是欺人太甚！

1967.08.02《桃子还是青的！——内战与团结》（炮轰派65兵团宣传部。16开，4页。手刻油印）：重大“八·一五”从革命组织堕落成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御用工具，“红成”从革命组织演变成走上了上海“红革会”的道路，是一条和平演变的道路。每个革命组织应该从这里吸取深刻的教训。革命组织内部的分歧矛盾，是很自然的。只要双方进行真诚的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我们衷心希望能够这样。

1967.08.10《关于当前支左工作的一些打算》（康定军分区支左办公室。16开，2页。打字油印）：1、建议分区党委在孔、王首长回来后立即分析一下康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确定对几个关键问题（如天宝、柳、王问题等）的基本态度，更加旗帜鲜明、有力地支持炮轰派。2、用一周时间，集训一次支左人员。3、迅速做好军内受反动路线打击同志的平反工作。4、领导同志和支左办公室人员，要经常深入到炮轰派广大群众中去，或以小学生的态度听取他们对分区的批评意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5、调查研究州一级当权派的情况。6、协助州生产委员会做好炮轰派平反的善后工作。7、宣传、推广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大联合，做好保守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8、围绕大批判，大联合和武汉事件，展开一个对保守派的强大政治攻势，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9、迅速摸清108地质队、独立师和所谓红成泸城纵队的政治态度和组织情况，判明性质，确定态度。

1967.09.13《中共四川省康定军分区委员会关于得荣县支左问题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得荣县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6开，2页。铅印）：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精神，在听取了得荣县两派的汇报后，分区党委就得荣部队支左问题决定如下：1、得荣武装部领导同志，由于没有抵制住分区个别负责人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在二至四月份支持和扶植了保守组织，打击、压制了革命造反派——原得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现“炮轰派得荣联络站”，把革命组织打成了“保皇组织”，非法宣布解散。这一方向路线错误的责任，主要应由分区个别负责人承担，武装部的同志只要及时转变过来，认真改了，就好了。但在中央《十条》决定下达后，武装部个别负责人反而继续支持、



扶植保守组织，这种对抗中央《十条》的行为，是不能允许的。2、现“甘孜州炮轰派得荣联络站”所属组织，是得荣县的革命造反派，是和康定炮轰派并肩战斗的，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程化之同志坚决支持康定“一·二五”夺权，支持天宝同志的革命行动，是应该受到赞扬的。过去颠倒黑白，强加在他头上的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等种种罪名，都应该彻底否定，予以平反。4、有些群众由于路线觉悟不高，一时站错了队，参加了保守组织，只要他们认识了，转变了，就还是好同志。

## 小报类——

《红色气象之声》（甘孜藏族自治州气象台“红色气象”革命造反派编。8开。手刻油印）第5期（1967.7.13。2版）：强烈控诉“二月黑风”中崔成友对我们的残酷迫害；王润富是个大叛徒；州台动态。

《614战报》（甘孜州气象台。8开。手刻油印）第12期（1967.7.19。3版）：崔成友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十恶不赦。

《炮声隆》（甘孜州炮轰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部主编。8开。手刻油印）第7期（1967.7.23。2版）：强烈抗议武汉老保非法绑架谢富治、毒打王力的滔天罪行。

《千钧棒》（甘孜总段捍卫毛泽东思想反修战斗队、红路灭资兴无战斗队编。16开。手刻油印）第10期（1967.5.26）：炮打王祥珠、牛在田——揭穿王-牛搞“两临”的阴谋；愤怒揭发“黑联总”的罪行。

《消息参考》（甘孜州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路反修战团编。16开。手刻油印）第2期（1967.7.18。5版）：红成犯罪行为之一。红成在北京没有市场，很臭，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在赶他们。

《遵义战报》（遵义造反兵团主办。8开。手刻油印）第5期（1967.6.6。2版）：军训本来是一件大好事情，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把军训搞成了拿枪的工作组，打击了广大的革命群众。

---

## 【编读往来】

### 蒋健来信纠错

15期上胡鹏池先生的文章《周恩来的一哭与一喊》，有几处史实上不严谨的错误，如：

“1971年9月13日晚，月黑风高，亲密战友乘飞机外逃了。”

——林彪出逃的时间不是“1971年9月13日晚”，而是刚过9月13日零点。

“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作何动静？没人详细知道。”

——毛泽东在9月13日凌晨就从中南海的游泳池搬到人民大会堂118厅了。

“周恩来则吃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三天三夜没合眼。”

——周恩来的随身警卫高振普说，周恩来当时主要是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里的北小厅工作和生活，而不是吃住在东大厅；另外，9月14日上午11时，周恩来就服安眠药上床休息了，何来三天三夜没合眼？

“消息最终是等来了：林彪及妻儿摔死在异国的沙漠里。”

——9月14日下午2时，王海蓉就向周恩来报告林彪一行九人摔死的消息啦，而不是“三天三夜”之后，“消息最终是等来了”。

另外，周恩来哭的时间是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而孙一先带着现场照片向周恩来汇报的时间是9月21日午夜，也就是说，周并非是在刚听说林摔死之后的当夜就哭的。

还有，说周恩来哭的时候，彭德怀已经死了，实际上彭德怀是“913事件”三年后才在屈辱中死去。

**本刊按：**

本刊将蒋健意见转告胡鹏池先生后，胡先生来信说：**蒋健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所提指正均言之有据，谢谢，致以敬意！**

有关胡文中提到“彭德怀死了”一处，蒋健、丁颖诸先生都来信指出有错，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是本刊在编稿时错加的，特向作者、读者致歉。

## 罗成胜来信谈文革中军队执政的后果

读了上期何蜀先生的《筌路蓝缕 填补空白——丁凯文〈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序》，该《序》中说：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后，“各地军队（有的是大军区，有的是省军区，有的是军分区或地方武装部）的党委实际上就已经取代了原地方党委的领导职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区的‘领导核心’。”这里的“有的”可以说明各级都有支左机构，但在我读后似乎觉得表述不够准确，因为不光是“有的”（即各级都有），而且关键是从中央军委、大军区到地方武装部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更何况是一种比原来的地方党政的上下级关系更严密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关系，所以，看似各级党政机构被老毛搞瘫痪了，其实就专制的程度而言更加独裁了。记得老毛说过：军队不能乱。之所以毛敢于那样让“天下大乱”，敢于搞瘫各级党政，就是因为有军队，有枪杆子——毛不是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最高原则吗？

无数的事实都已经证明，当事情最终“由枪杆子说了算”时，专制只会更加独裁，更加残酷。